

出版社

为了塞尔维亚人民和国家基金会

出版人

Bojana Radakovic, 董事

编辑

主编

Zoran Jevtovic 博士、教授

政治

Uros Suvakovic 博士、教授

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

Ivan Mrkic 大使

欧洲法律与欧盟政治制度

Branko Rakic 博士、教授

Zoran Cupic 助理教授

地缘政治学

Ljubisa Despotovic 博士, 科学顾问

国防与安全

Radoslav Gacinovic 博士, 科学顾问

历史

Marko Atlagic 博士、教授

Dalibor Elezovic 博士、教授

文化

Bojana Boric Breskovic 硕士

环保

Darko Nadic 博士、教授

媒体与社会

Dejan Vuk Stankovic 博士、教授

这本杂志每年出版三期。

首期出版于2020年6月28日Vidovdan日

发行量: 500份 印刷厂: 贝尔格莱德Birograf

编辑部地址: 贝尔格莱德Palmira Toljatija路 5号

<http://fondacijasnd.rs/casopis-napredak/>

论文以电子方式提交

本期专刊分别以塞尔维亚语、英语和中文出版。

CIP - Каталогизација у публикацији  
Народна библиотека Србије, Београд

32

НАПРЕДАК : часопис за политичку теорију и праксу / главни  
и одговорни уредник Зоран Јевтовић. - [Штампано изд.]. - Vol. 1,  
по. 1 (2020)- . - Београд : Фондација за српски народ и државу, 2020-  
(Београд : Бирограф). - 24 cm

Три пута годишње. - Тематски бр. 2 (2021) „Сто година од формирања  
Комунистичке партије Кине“ објављен и на енгл. и кин. језику. - Друго  
издање на другом медијуму: Напредак (Београд. Online) = ISSN 2683-6114  
ISSN 2683-6106 = Напредак (Београд)  
COBISS.SR-ID 15570185

## 目录

期刊专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社论

- 宋 涛  
波澜壮阔 百年辉煌——写在党的对外工作100年之际 . . . . . 5
- 伊万·莫尔基奇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 . . 9

### 文章

- 宋 涛  
为中国人民幸福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 . . . . 25
- 石晓虎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与理论创新 . . . . . 33
- 王存刚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  
——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 . . . . . 41

林永亮	
“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基础框架与发展路径	51
丁一凡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新发展格局	61
李 巍	
历史进程中的国际经济制度与中国的角色	67
甘冲	
中国脱贫攻坚成就的世界意义	77
扎尔科·奥布拉多维奇 教授	
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超）权力要素	81
萨尼亚 阿雷齐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103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中国的生态之路	123

## 书评

普雷德拉格巴伊奇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金砖”中国	143

UDK 327(510)  
社论  
投稿 18/06/2021  
收稿 18/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804

# 波澜壮阔 百年辉煌 ——写在党的对外工作100年之际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宋 涛



百年风雨，春华秋实。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诞，也迎来党的对外工作100年。10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伴随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全过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全面推进“抓政党、抓调研、抓人脉、抓形象”，面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和世界意义，坚决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新成效。如今，我们党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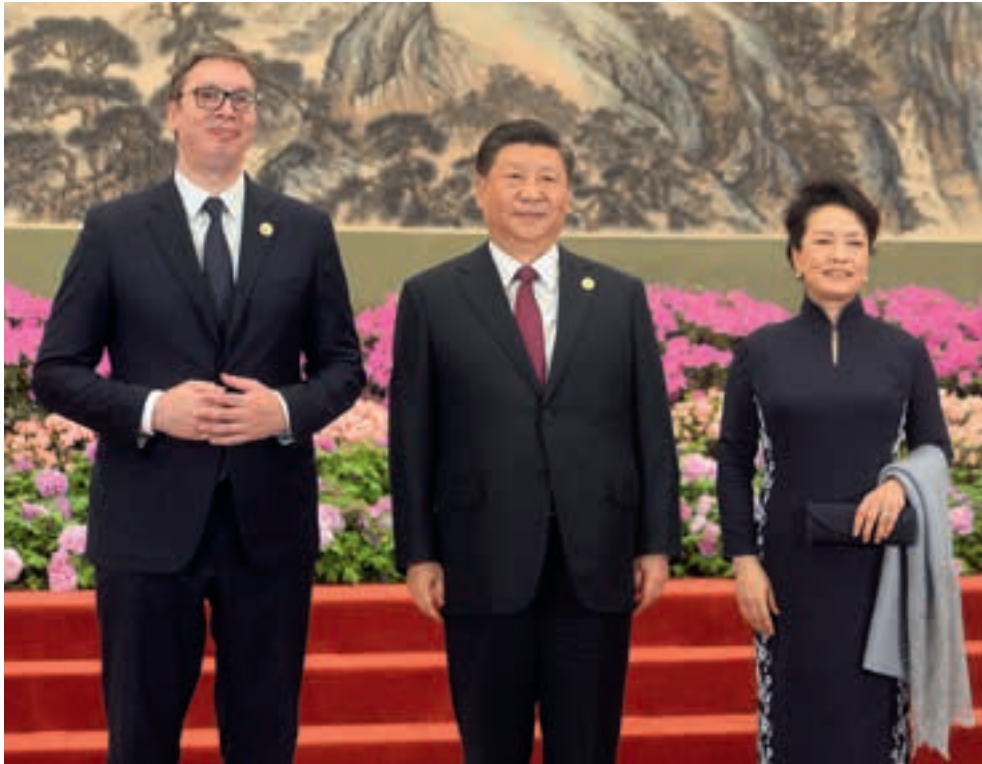
同形式的关系，构建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成功召开，并发展成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中共理念、中共故事、中共贡献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政党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为世界发展繁荣贡献思想理念，前所未有地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力量信心。

这些成就的取得，最根本的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领袖的领航掌舵，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系列重要论述提供的根本遵循。回顾党的对外工作百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我们深刻认识到，做好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根本政治保障和最大政治优势；必须坚持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体现的根本属性和定位，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始终从党的立场、党的需要出发谋划和推进工作；必须充分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对国际社会政治引领，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党的对外工作规律性认识，推进党的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守正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航船，正以前所未有的昂扬之势，承载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肩负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使命责任，朝

波澜壮阔 百年辉煌  
——写在党的对外工作100年之际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宋 涛

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彼岸，扬帆搏浪、奋楫笃行。我们将立足于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学习贯彻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在党兴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贡献。



图片来源：新华社

2019年4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UDK 329(510)  
327(510:497.11)  
社论  
投稿 29/06/2021  
收稿 29/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948

伊万·莫尔基奇  
塞尔维亚前外长  
塞尔维亚对俄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摘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及发展壮大的历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接着着重阐述了柏林墙倒塌以后形成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并通过事实论证了中国历史和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无比重要性。文章最后简要阐述了塞中关系，并在结论中再次强调了作者提出的主要观点。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塞尔维亚、新地缘政治、当代中国政治、新冠病毒、“一带一路”

## 前 言

一个世纪前，十三位中国人在上海决定于同月（7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在上海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楼里秘密举行的，这栋小楼至今仍保存着原来的模样。根据史料，在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全中国约有五十多名共产党员，他们决心要改变社会生活现状和现有制度，要为中国这个历史上的“

中央之国”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而奋斗。参加那一次历史性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维埃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先驱者的伟大思想的激励和鼓舞下，在要为大多数被压迫人们伸张正义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纲领和任务。这些共产党人中就有二十二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一九二一年，肯定没有人预料到有一天共产党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我们将在今天一起纪念它一百周年的诞辰；当时也肯定无人能够预料中共在其发展道路上会付出多么巨大的牺牲，应对多少难以想象的挑战，经历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一场场胜利甚至失误，最终取得今天令全世界瞩目的最伟大的成就。

如果对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进行阶段划分的话，不管按照什么样的划分标准，往往都与领袖个人紧紧相关。许多现代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毛泽东的最大功绩就是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并将中国从外来侵略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并使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取代了台湾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中国代表权席位，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中国实现了完全独立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大事记年表可能永远也没有最终的结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树立民族自信。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风云多变的转折时期，然后进入了邓小平领导下的新时期。邓小平是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政治生涯里经历了数次起起落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毛泽

伊万·莫尔基奇  
塞尔维亚前外长  
塞尔维亚对俄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东带领中国进行了第一次革命，而邓小平则领导了第二次革命。为了实现中国的发展，同时坚持并维护其基本原则，他带领中国走对外开放的道路，推进中国社会的内部改革，建立起特殊的市场经济模式，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二十四字方针，至今仍常常被人提及。

可以说，中国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正带领着中国人民进行所谓的第三次革命。习近平出生于一九五三年，是中国第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以卓越的才能、超凡的工作能力以及毋庸置疑的奉献精神一步步坚韧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十分了解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善于体察民情，每一个顺利完成的使命都在证明了的事业走向成功，也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天中国的国家元首。

密切关注中国发展和中国时事的专家认为，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把提高国民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把为人民谋福祉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目标的国家领导人，这在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就在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宣告中国已解决了贫困问题，从这点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位中国领导人所具有的领袖人格以及中国在他领导下建立起的卓有成效的国家机制。

他于二〇一三年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也通称“新丝绸之路”）并作了明确的阐述，之后就有几十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该框架下的合作协议。我们认为，未来的合作范围扩大到上百个国家地区也不足为奇。这一伟大愿景的基本构想是，现中国政府为自愿

加入合作机制的国家提供优惠的项目合作,实现这些国家在公路、铁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目标,以建立并加强扩大合作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国家内部稳定和发展。二〇一二年,中国又与中东欧国家在华沙建立了“17+1”合作机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这一合作得到不断发展。

### 新地缘政治现状

在柏林墙倒塌前后,美国和西欧都沉浸在一种欣喜若狂的气氛里。华沙条约组织和苏联都解体了,不复存在了,而北约却在不断扩张。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间的冲突开始酝酿,并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终于演变成内战和种族战争(也有人称是宗教战争),最后以南斯拉夫解体而告终,同时造成无数伤亡,尤其是平民的伤亡。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十年间,让人明显感觉到世界形成了一国独大的垄断局面。另一方面,令人备受鼓舞的是,一些地区强国凭着自己坚定的努力和信念,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今天常常被人称道的多元化世界。世界出现了数个权力中心,这种格局对真正信仰民主的人们来说是值得欣慰的。近二十年来,上海合作组织(SCO)、“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机制相继成立,同时土耳其、伊朗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约十年前,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总收入位居世界第二,而外贸进出口总额长期以来一直居世界第一。众所周知,中国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年内实现国民总收入翻番的国家。中国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但不幸的是其中也不乏心怀叵测之人。“修昔底德陷阱”

伊万·莫尔基奇  
塞尔维亚前外长  
塞尔维亚对俄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个术语经常在美国理论界及其他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及，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Allison, 2017)。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一五年九月访问美国时也提到了这个所谓国际关系的“陷阱”，并有理有据地、极有说服力地阐述了陷入这种固式思维的危险性，他强调中国决不谋求政治霸权，因为他坚信不管民族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别，但在这个地球上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世纪初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远航船队漂洋过海，访问了亚非许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有人认为他的七次航行中有一次甚至到达了南美海岸）(Menzies, 2002)。据史料记载，郑和率领的船队最多时有数百艘船只，船上官兵有二万七千人。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在明朝强盛时代，郑和在船只经停港口及沿海国家与当地人民开展贸易、交换礼物等活动，当他收到中国没有的珍稀动物等赠礼时总是心怀感激，却一刻也不曾有过建立殖民地的企图，更别说对那些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一四八九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众所周知，他的舰队仅有三艘船只）要比郑和下西洋晚许多年，更不提那靠几艘船便奴役了数百万原住民的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了，还有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在十六世纪带着几艘船航行到中国澳门，而对澳门的殖民统治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才结束。郑和下西洋的这段历史应该在世界所有教科书中当作重要事件进行讲解，因为它用事实告诉我们文明冲突不是必然的“铁律”，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许多中国当代社会理论学家坚持的观点，即对立（如阴阳对立）并不意味着冲突，对立双方经过几代人的学习和努力，可以实现相互理解和融合，甚至达到和谐。这种观点其实也包涵了许多基督教文化的元素，如一贯弘扬的和谐、宁静与博爱的基督精神。

我们的上述论点是经过历史和社会的验证的，而只有一方单方面地采取自私的行为时，它才有可能被推翻。所以说，今天所有坚称倡导真正和平与人类普遍福祉的人都应接受检验，如果有人在实际事务中继续不断阻挠这种价值体系的实现，那么他们立下的宣言必将受到最大质疑。

事实证明，普遍接受的最高形式的民主应基于真正的相互尊重和理解，了解对方的需求，而不是排他性的只顾实现己方的贪婪利益。今天，科技发展成果、即时信息以及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即时通信、太空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战争等，使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有时候，发明与创新的成果似乎超越了人们现有的对相邻民族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关系的认识。人类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我们也越来越有理由自问：在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抉择关头，人类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应对。显然，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人工智能，而且最重要的是，时刻都不能忘记世界上一切存在的前提，不能忘记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追求幸福，摆脱恐惧的权利。

我们再回到当今国际关系这个话题。诚然对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是世界大国，但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宪章》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础，它非但没有过时，甚至还是解决当今世界上许多冲突的准则，时时要求我们回到它的原则框架下来。《联合国宪章》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同等尊重的一部国际法典，其他所有声明、战略方针、纲要、协议（公开的和秘密的）都应完全符合该宪章精神。

中国执政党从未违背过《联合国宪章》。在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没有一项国内外事务的重要决策及其实施是建

伊万·莫尔基奇  
塞尔维亚前外长  
塞尔维亚对俄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立在损害他国和其他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试问：如果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将会怎样？各国的发展又将何去何从？中国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对教育科学的大力投资、参与世界资本流动、遵守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关系秩序（尽管北京并没有参与其制定）、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人口最多国家实施的有效组织管理、稳定国内形势、消除贫困、增加就业、科技创新和新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增加境外投资、推动多边主义、无条件向他国提供援助等多方面的努力，当之无愧地在国际关系中占核心地位，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经常有人批评中国具有扩张野心并想成为他国的主宰，这些声音往往来自那些拥有无数距其本土数千公里的军事或其他基地的国家。一旦未来有国家可能以美国现有的方式取代其今天的大国主导地位，这对他们来说自然大为不妙。

如果没有了中国，今天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在历史上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文明是自诞生至今从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据说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四百五十位皇帝，而它诞生的年代连科学家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辛格在他的著作中甚至提到，中华民族没有关于自身起源的传说，这也是它与其他民族相比较为特殊的地方（Kissinger, 2011）。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在十九世纪前一直都是经济大国，在数个世纪里其贸易量和国民生产总值都位居世界首位，理当是当时主导世界经济的国家。正如傅高义所说的，美国应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并公平待之（Vogel, 2013）。

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十月访问日本时与东道主有过数次会谈，当时的

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谈到那次与邓小平的会晤时曾说：

“邓小平向自己的东道主谈到此次访日的目的有三，一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二是向近几十年来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日本老朋友表示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刚落，会场就发出一片笑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两千两百年前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寻找仙丹的典故。邓小平接着说，他所说的‘长生不老药’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希望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中国向世界开放政策的基础就是那个时候奠定下来的，这意味着逐渐摒弃陈旧过时的思想意识，不着痕迹地逐渐融入世界资本和贸易市场。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点就落在与香港接壤的一个不起眼的渔村——深圳。当时情况下，在首都北京、上海等政经中心或省会城市进行改革试点，决非明智之举，于是便选择了一个看似无关大局的地方进行试点。四十年后，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的时代，深圳的经济总量已达到香港的水平！加之深圳还是华为、腾讯等几家世界领先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深圳毋庸置疑地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经济的腾飞。

不过在我看来，衡量一个政权的领导是否成功的最直观的标准还是全社会的扫盲率。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的教育人口覆盖率已达到百分之百。我相信这个事实最能说明一个国家政权的成熟度，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再比如，中国全体公民都有健康保险，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时，那么其他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



伊万·莫尔基奇  
塞尔维亚前外长  
塞尔维亚对俄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可以肯定的是，全民的教育普及必定大大促进了中国研发领域投入的逐步增加，我们也相信中国已实现了将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五用于科研创新的目标。中国已经成功制造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之一——天河二号。中共最高权力机制（最近一次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等）做出决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亲自指示，中国在技术上必须实现自主创新，不能依赖于从那些对中国政府抱持反感或极不信任甚至敌对态度的国家及其公司进口（China Daily, 2020）。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中国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当然，这一决策并不会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友好国家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甚至还会继续加强和进一步扩大。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成功举办了专门的外国商品进口博览会，这可能也是开世界先河之举。此外，中国党和政府领导层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其影响超越了迄今为止人类史上的所有认知。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一次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会议的主旨讲话中，指明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继续前进的方向，提出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应该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型，从数量规模的扩大转向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此有必要再次重申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事实），实行“双循环”经济政策（即加强国内购买和消费能力，继续发展对外贸易）等重要方针。今年年初又制定了至2025年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以及至2035年的远景目标。如果除上述之外我们再补充一条，那就是中国新出台了对于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的法律，那么我们一定能够

领悟到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前不久，全世界都见证了中国航天探测器登陆火星表面，我们还知道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将航天器送入月球背面的国家。这些成功尝试的背后要求掌握最复杂最精密的太空技术，而在此之前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掌握这种技术。显然，中国在征服太空的某些技术制造领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这对于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尤其值得称道。

有许多消息来源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首例患者是在中国确诊的，随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现了感染病例，但面对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大部分国家都措手不及，被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呈指数级增长。反观中国，虽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通过巨大努力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不仅仅是卫生系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成功遏制了来势汹汹的疫情，控制了新冠病毒，再次体现了中国政府的高效以及对人民健康的关怀。在本文完稿之时，疫情在世界上已蔓延了将近一年半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累计确诊病例没有超过 10 万（而全球的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了 1.6 亿）。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率先接种疫苗的国家之一，而在许多国家都急需疫苗的时候，又是中国站出来帮助这些国家解决疫苗供应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批准使用并向全球推广中国国药疫苗。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接种了疫苗，这一事实本身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高效的行政组织能力。

中国终于能够做到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不再基于远期的可能性或最终战略目标，而是根据当前实力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了”。

伊万·莫尔基奇  
塞尔维亚前外长  
塞尔维亚对俄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塞尔维亚与中国

塞尔维亚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尤其是在涉港涉台问题上。在国际多边场合，我们两国声明的立场几乎都是一样的。同样，中国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上对我们的支持也意义重大。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习近平主席有过十多次会晤，两位领导人之间还保持着经常性的和例行沟通。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塞尔维亚那样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华对俄合作的国家委员会，主席是前总统尼科利奇先生。这个专门委员会有九名成员是塞尔维亚内阁部长。

塞中目前有许多交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建设项目正在实施，总投资额超过了100亿美元（有人估计已达到120亿美元），这些项目中有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普莱宁纳—波热加高速公路、塞匈高铁等建设项目。中资企业收购了斯梅德雷沃钢厂和波尔铜矿，中国公司承建了跨多瑙河和跨萨瓦河大桥，还参与了其他领域对塞尔维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设项目。

塞尔维亚不会忘记在疫情期间中国所给予的援助，我们尤其感谢中国赴塞医疗专家小组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为我们控制疫情提供了实际帮助。

最后我再次强调，塞尔维亚共和国绝不会同意对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实施制裁，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过这种痛苦经历，对此感同身受，所以无法赞同制裁措施。

我们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十分牢固，日久弥坚，定将走向更灿烂的未来。

## 结 论

中国是最早拥有并培养国家意识的国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以以此为傲的国家之一。大家都知道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所著的《从皇帝到公民》一书，它记载了一个经历了这种转变的幸存者的独特感受和历史见证（这里我们不提“普通”的国王们和王后们）。和溥仪一样，中国也成功经历了从强大的帝国走向基于社会公正的强大共和国的历史性转变。

可以想象到大仲马的忠实读者们可能会套用他的一句格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来解读社会主义原则，可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就树立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但中国同时也用事实证明了，国家利益始终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是个人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

中国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中国人民才能收获生活的美好硕果。这种认知在表面上看似有其矛盾性，但经过深刻思考后却会发现其背后的逻辑性。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参与二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中国，反而积极倡导新秩序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当然这过程中也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

中国不仅因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也因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成为世界强国（Novačić, 2018）。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在许多人眼里已是“过时”的社会制度。然而，众所周知，要建

伊万·莫尔基奇  
塞尔维亚前外长  
塞尔维亚对俄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设一个让人民真正能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及政权体制，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道路，而事实证明，中国的现有社会体制确实能够使中国社会在各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

在此我想再重申一下自己曾多次阐明的观点。我认为在现代世界一味鼓吹和美化个别联合国成员国的社会制度是没有意义的。国际关系中的真正民主应该体现在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选择，而且这种选择理当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尽最大努力坚持代表当今文明进程最高点的生活原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应以此为借口对别人指手划脚，这种行为势必会给自己减分。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只是中国特有的。诚然，中国在战争和战后时期也吸取了当时情况下对自己有帮助的其他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并忠实地予以贯彻执行，有时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今天的中国政府确实在许多领域都表现出了它的高效性和独特性，毋庸置疑是智慧型和全面型的领导机制。

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金晓蕾 译）

### 参考书目：

- Allison, G.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In English]
- *China Daily*. Highlight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explanatory speech on CPC proposals for 14th Five-Year Plan, targets through 2035. [In English]

- Kissinger, H. (2011).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In English]
- Menzies, G. (2002).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London: Batam press. [In English]
- Novačić, A. (2018). *Xi Jinping, Chinese dream*, Београд: Филип Вишњић. [In Serbian]
- Vogel, E. (2013).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In English]

**Ivan Mrkić**

Form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Serbi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Russia and Chin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mmary

The text speak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 beginnings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ategorizations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new geopolitical reality has been explained, especially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argumentation is made about the peculiaritie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modern development. The immeasurable importa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governing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is pointed out. A short sect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rbia and China has been included. The conclusion highlights the general views encompassing most of the claims presented in the previous text.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rbia, new geopolitic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COVID-19, Belt and Road

文章





UDK 316.323.7(510)  
327(510)  
文献资料  
投稿 18/06/2021  
收稿 18/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803

# 为中国人民幸福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宋 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和抹黑政治盛行。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增多，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但也应看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中国共产党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强权政治，为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崇高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定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2020年中国将迎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时刻，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外国政党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减贫成就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危机时刻、重大关头将什么放在第一位，最能看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性质和本色。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位患者。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支援湖北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56.1%是中共党员，近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多国政党政要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疫斗争体现了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美国一家知名公关公司日前发布的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信任度高达95%，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血

肉联系，任何抹黑和挑拨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刻的烙印和最鲜明的底色。

### 中国共产党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和平的可贵，也具有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秉承中华民族文明血脉中的和平基因，领导新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将之郑重载入党章和宪法。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与各国政党一道，积极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许多外国政党政要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来没有发动一场对外侵略战争，始终是支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当前，国际形势持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乱象抬头，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安宁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新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谋求势力范围。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尊严，绝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各国政党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积极与周边国家政党深化安全互信与沟通合作，推动南海局势不断趋稳向好，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赏。120多个国家240多个政党、政治组织以及280多个知名智库、非政府组织主动发声，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面对近期少数域外国家一再煽风点火、搬弄是

非, 周边国家始终冷静看待、从容应对。许多地区国家政党领导人主动向中方表示, 有些国家企图在南海挑起动乱再一走了之, 最后受害的是地区国家和民众, 我们决不会上当。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同周边国家政党加强团结合作, 共谋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道,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 中国共产党是公平正义、责任担当的坚定实践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 公平正义还远远没有实现。各国政党应该共同展现责任担当, 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捍卫多边主义, 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许多外国政党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抗疫国际合作, 积极开展抗疫援助, 与一些国家忙于对外“甩锅”、肆意挥舞制裁施压的大棒相比高下立判。110多个国家的240多个重要政党和政党国际组织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发出共同呼吁, 坚决反对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 为进一步深化全球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凝聚了强大的政治共识。

中国共产党秉承中华民族重义守信的传统, 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 做到“义之所在, 不倾于权, 不顾其利”, 自觉承担应尽的责任、展现应有的担当。我们党旗帜鲜明地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霸凌霸道行为, 坚定捍卫和践行多边主义, 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得到各国政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党在国际交往中讲诚信、讲感情, 结交了许多真朋友、好朋友。这次疫情防控期间, 各国政党和各界

人士纷纷向中方施以援手。我们党在扎实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投桃报李、雪中送炭,向200多个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书写了世界政党共克时艰、守望相助的佳话。承诺的责任一定履行,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这是我们党对外交往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品格。许多发展中国家政要表示,一些国家承诺的援助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或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中国共产党不一样,说话是算数的,是真心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 **中国共产党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坚定推动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不平凡历程,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靠的是“自己的担子自己扛”的责任担当,靠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开拓。同时,我们党注重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为世界经济和全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国政党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的党。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影响和促进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并将继续惠及全人类。

中国共产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针对发展不平衡这个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出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

一路”正成为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许多国家政党政要和民众都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绝非某些政客所渲染的“势力范围”和“债务陷阱”，而是一条引领各国实现共同繁荣的阳光大道，为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开辟了光明前景，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展倡议”。

解决发展问题既要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致力于同各国政党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已邀请几万名外国政党代表来华考察，并与各国政党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交流活动，围绕基层党建、反腐倡廉、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议题深入交流，分享经验，促进合作。许多外国政党政要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同世界共享经济发展红利，而且毫无保留地分享思想理念红利，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

### 中国共产党是开放包容、文明互鉴的坚定引领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科学基础和基本依据。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路，不会“输入”外国模式，也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在对外交往中不

以意识形态划线，获得各国政党普遍认同和高度评价。

多国政党政要表示，不同文明文化和社会制度和谐共生、交流互鉴，才是共建人类美好未来的正确选择；将国家间分歧归咎于不同文明和制度的差异，为党同伐异、以强凌弱制造借口的错误做法，严重破坏现行国际秩序，更有导致不同文明陷入隔阂冲突的风险。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的文明创造，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近年来，我们党积极探索同世界各国政党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原文为：同168个国家的近600个政党和政党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搭建起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成功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彰显了我们党巨大的政治包容性和道义感召力，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为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样子”。作为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人类共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作出重要贡献，与世界各国政党一道，共同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努力开创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港珠澳大桥是有史以来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55公里



UDK 329(510)  
327(510)  
专业论文  
投稿 09/06/2021  
收稿 21/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684

#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与理论创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院长 石晓虎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在继承和发展中稳步推进对外交往工作,实现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实践飞跃和理论创新,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与国家总体外交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入总结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实践与理论创新,探索蕴含其中的基本逻辑和原则,对促进政党外交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不断提升政党外交的贡献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外交; 实践与理论创新; 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开展的与国外政党的交往自然而然地演变为政党外交。70年来,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深刻把握历史使命和角色定位,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探索,在总结经验

教训中不断提高,在调整中不断创新,实现了理论的持续升华。深入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创新与理念创新以及两者的有机互动,有助于在新时代谋划政党外交新发展,开辟政党外交新局面。

###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大飞跃

过去70年,中国共产党秉持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宽阔胸怀和国际视野,深刻把握国际形势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基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从全局高度和长远角度谋划政党外交,并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探索政党外交的大发展,推动政党外交大体实现了三次大的飞跃,逐步形成目前的政党外交新格局。

一是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从“兄弟党”关系逐步发展为正常的政党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一些国家共产党关系出现波折,其交往对象数量严重萎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实现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交往的正常化,先后恢复与欧洲、西亚北非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共产党的关系,逐步调整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与原东欧地区各国新建共产党或更名后的左翼政党建立联系并保持正常交往。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共产党、工人党等进步力量的党际关系时注重突出性质、理念和道路追求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寻求扩大共识,但在实践中也强调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二是从只同共产党、工人党交往发展到与各国合法政党建立友好

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打交道，新中国成立后零星与发达国家社会党有过交往。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从1977年起开始与南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从1981年起，中国共产党通过与法国社会党建立联系，逐步扩大与发达国家社会党的交往与合作。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还根据国外政党政治新变化，与欧洲国家一些新生的不同类型政党建立关系。截至目前，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共产党“朋友圈”党政并蓄、朝野相济、官民兼容，并且还在不断扩大。

三是从双边交往为主逐步发展到双多边并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吸取刚刚解散的第三国际的教训，没有加入苏联牵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外交往以双边交往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与社会党国际建立联系，启动政党多边交往进程。冷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大与地区和国际政党组织的交往力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与欧洲中右翼政党建立联系。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还同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欧洲左翼党、欧洲绿党、拉美政党常设大会、圣保罗论坛、非洲政党理事会等保持经常性交往。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办并逐渐机制化。

###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创新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建设，不断加强与国外政党交往的理论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通过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等

打交道，初步形成了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一些认识和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在革命斗争时期形成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原则和精神引入政党外交，强调各党有权自主决定各自事务，反对盲目照搬别国经验；主张各国政党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开始提倡不同性质政党要相互包容，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前提下，也可以求同存异、开展合作；强调重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合作，反对从“一国一党”利益出发，损害其他政党的正当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探索与各国政党建立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促进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更加牢固、更加持久。同时中国共产党就处理党际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超越意识形态、妥善处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原则。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对外工作跨世纪发展的指导方针，指明政党外交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逐步明确了政党外交的定位——“既是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又进一步提出政党外交要努力成为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努力成为展示党的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窗口，努力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观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台，努力成为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央决策服务的重要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迎来理论建设的新时

期。习近平同志亲自参与指导党的对外交往，提出“抓政党、抓调研、抓人脉、抓形象”的总要求，主张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明确中国共产党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中国共产党还顺应形势变化，提出探索打造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的工作布局，探讨建立政党外交“大协同”机制，不断提升政党外交对国家总体外交的贡献。

###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创新的突出特点

一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党情相结合，主张相互平等、互相尊重；反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上级党”与“下级党”等不正常关系，强调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政党内部事务。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时代主题的转变，创造性地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使之更具时代性、科学性，尤其是打破意识形态窠臼，不断扩大交往主体的多样性，在与各类合法政党交往中均提倡完全平等、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寻找最大公约数，以更好地开展党际交往。

二是体现了高度的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善于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主题，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丰富政党外交内涵，指导政党外交具体实践并取得较好效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谋发展、图治理的共同诉求以及发展中国

家普遍“向东看”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更加突出交流互鉴，增进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以促进提升各国政党的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外交基于自身定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

三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始终引领理论创新。党的最高领导人是政党外交最重要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不仅具体参与、指导政党外交，而且亲自引领理论创新。党的最高领导人善于在历史的转折中总结开展政党外交的经验教训，推动理论的大飞跃，善于在把握时代脉搏、加强外交顶层设计时谋划政党外交新布局，善于在回应国际社会关注、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等方面解决涉及政党外交的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政党外交理论创新，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理论，为政党外交更好地服务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供良好理论支撑。如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以及构建思路做了进一步阐述，提出要在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开启了新时代政党外交工作新境界。

四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互促进。7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党外交过程中兼顾目标导向、过程导向、问题导向，在观察国际形势时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善于端起历史的望远镜总结经验教训、把握前进大势，促进了政党外交的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探索政党外交发展规律，深刻总结党际交往有益经验，进行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实现理论升

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相互激荡,使得中国特色政党外交道路越来越宽、前景越来越光明。

###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历史贡献

一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1949年10月1日,刚刚宣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承担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中国共产党需要多交、广交、深交朋友,努力打开对外关系局面,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中国对外交往处于低潮时,政党外交通过做主要大国及重点国家政党政要等工作,扩大国际交往面,逐步促进外部环境的好转;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时期,则着力夯实基础工作,持续扩大全球“朋友圈”,促进巩固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1世纪以来,在应对涉台涉藏涉疆问题、朝鲜核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南海问题、中美经贸摩擦等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政党外交也发挥着做人的工作优势,前瞻性介入、全程做工作,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二是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实现国家关系稳健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往往按国家制度和政党属性来决定关系亲疏,这种自我设限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必要性,但不可避免也会带来一定消极效应。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更多融入世界,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淡化对外交往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扩大与各国各类合法政党交往,进而实现与多数国家朝野主流政党同步交往,确保在出现国家政权更替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重视

欧洲新兴政党的异军突起之势，加大交往力度，增进相互友谊，起到积极成效。意大利、希腊等部分南欧国家新兴政党上台执政后，无视美国等少数国家对华诋毁，深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力度，加强对华战略倚重，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和热情持续上升。

三是发挥大国大党作用，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特色公共产品。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始终受到高度国际关注和较多国际期待。如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实现现代化之策和中国共产党党建经验做法，以及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方向发展等。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希冀中国能在促进世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际社会的高度期待无疑是促进政党外交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注意回应国际诉求，及时提供有效的国际公共产品。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通过深入交流对话凝聚广泛共识，引领国际舆论，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国际软实力。

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历经新中国70年风雨历程，当前正处于开拓创新、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对外工作将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围绕自身定位和职责加强科学谋划，充分发挥“大协同”的制度优势，不断开创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UDK 327(510)  
原创研究论文  
投稿 09/06/2021.  
收稿 22/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692

#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 外交转型 ——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 视角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王存刚



**【内容提要】**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1949—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新型国际关系; 外交转型; 中国外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与外交史的最大转折点。信仰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政权,中国外交由此具备了开辟新局面、谱写新篇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外交虽历经三次转型[1],但始终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以此为成果实现外交转型。

###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型: 从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到大国外交**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49年,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其核心是由“屈辱外交”向“立国外交”转变。新中国外交通过这次转型,彻底改变了持续近百年的“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尴尬姿态,确立并奉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以独立自主为底色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使中国很快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进而陆续与“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即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北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由此,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中国一度奉行“革命外交”,包括采取“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形成“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的外交姿态,其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一度十分严峻。[2]但随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与中日建交，“革命外交”的观念和做法逐步被淘汰，新一轮外交转型蓄势待发。

新中国外交的第二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标志着这一轮外交转型的结束，其核心是从“立国外交”向“富国外交”转变。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他还宣布，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其核心是经济建设。[3]围绕上述三大任务，并基于对时代主题的崭新判断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中国对外交指导思想和具体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的外交路线，坚定奉行“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政策。中国外交由此呈现日益活跃与主动的态势。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陆续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同周边绝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了友好关系。此外，中国还先后参加了许多重要国际组织及全球和地区多边外交机制，对外关系框架进一步完善。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的头10年，面对冷战后新态势，中国坚持奉行邓小

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大国、周边以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继续取得积极进展，多边外交更加活跃，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

新中国的第三次外交转型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其核心是从“富国外交”向“大国外交”转变。2008年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出色，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标志性事实预示着中国外交新一轮转型的必然性。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两大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重要论断。2013年10月，习近平明确提出“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的新思路，并作出全面部署。“奋发有为”一词因与此前较长一段时间里使用的“韬光养晦”一词对比鲜明，旋即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至此，新中国外交第三轮转型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在这次外交转型过程中

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中的指导地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深化和完善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经形成；在加强党对外交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外交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形成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调局面；外交姿态更加进取，强调主动谋划和顶层设计，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型，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发展和进步，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创新能力。它在为社会主义中国安全、发展和繁荣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新中国外交始终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1949年春，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将要奉行的被称为“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另起炉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重建中国的对外关系。二是重建外交体制和外交队伍。“另起炉灶”方针的效果显著而积极，正如新中国外交的卓越奠基人和伟大实践者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sup>[5]</sup>总之，这种新型国际关系构成框架实现了新中国外交第一次转型的目标。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这一重要概念。但这种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底色的新型国际关系起初仅限于指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后，随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所变

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坚守，是新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次成功实践。[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演化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通过的十项原则，就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原则；1970年和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宣言明确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外交第二轮转型的开启，调整“新型国际关系”的认知和实践随之展开。邓小平是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框架下思考“新型国际关系”问题的。在他看来，“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至于应当用何种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邓小平主张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7]最有生命力，最经得住考验，能够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并作出进一步发展。江泽民呼吁“恪守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倡议“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8]江泽民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9]江泽民在阐述新型国际关系时还突出强调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指出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胡锦涛则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和“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10]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化。总之，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反复强调了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的必要性,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有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新中国外交第三轮转型渐次展开,外交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动建设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曾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反复提及“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概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更为系统地提出要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新型国际关系的三项标识中,相互尊重是基本前提,它意味着各国在互动中应当视对方为平等伙伴,愿意通过协商方式和平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和分歧,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而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公平正义是基本原则,它意味着各国在互动中应当共同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愿意通过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因而它与践踏规则、偏私邪恶是根本对立的;合作共赢是基本目标,它意味着各国在互动中要放弃对抗手段,在相互协调中实现自身目标,因而它与单边主义、赢者通吃理念是根本对立的。

习近平外交思想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思想深嵌新中国外交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特别是创新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新时代的鲜明特点;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以及“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开放胸怀;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精神实质上高度一致,并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以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与人类文明发展

趋势完全契合,必将为全世界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已经为构建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首先,中国坚持把发展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突破口。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具有指向性意义。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多年来始终在高水平上快速发展,为各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可资征引的范例。其次,中国坚持把与欧洲诸国的关系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着力点。欧洲是传统国际关系的滥觞之地,但欧洲的国际关系已较此前数百年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中国与欧盟国家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因此,中欧彼此建立和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有着现实基础。当代中国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更是明确提出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的重大倡议。[11]

广义上讲,1949年以来新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长期实践,是对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持久性、历史性超越。在传统国际关系中,基于防范心理而产生的战略博弈是最为典型的形态;对抗、冲突乃至战争是相关各方处理彼此关系最为常用的手段;形成均势乃是相关各方对彼此关系的预期。传统国际关系之所以能够生成并持续存在,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解释,是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所致。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和演化,使得“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即便是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



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12]人类显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力巨大的悲剧反复上演,必须找到新办法、发现新路子。新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持续努力,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 新中国外交转型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 历史经验与未来展望

三次转型是70年新中国外交史的重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新中国与世界关系持续变化、中国领导人对时代主题认知的不断更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外交转型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规约了努力方向;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则体现和丰富着外交转型的具体内容。

从具体实践上看,新中国外交的每一次转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每一点努力,在塑造中国外部环境的基础上,都会促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外交转型特别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已经超越双边层次、地区层次,超越单一领域,产生全球性、多方面的广泛影响。

展望未来,面对世界转型过渡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国际形势,面对历史交汇期更加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无论是稳步推进新一轮外交转型,还是积极构建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都需要有更多的创新思维、理念和举措。只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服务民族振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加有效地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更加有力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就会更好地造福中国人民、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

[1] 对于何谓外交转型,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外交转型是指一国对其外交事务的构成要素、层次与内容进行部分重大改变的行为。从构成要素上讲,外交转型涉及外交理念、外交原则、外交目标、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体制、对外行动方式等多个外交具体方面;从层次上讲,涉及全球、地区、双边等三个基本层次;从内容上讲,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社会生活领域。

[2] 杨公素:《对新中国“革命外交”的几点回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3期,第45-50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4]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6] 2014年6月,习近平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

[7] 同[3],第282-283页。

[8]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479页。

[9] 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载《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10]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83页。

[11] 同[4],第102-103页。

[12]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 “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基础框架与发展路径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林永亮



林永亮,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等方面研究。

**【内容提要】**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其框架内各类机制和平台不断涌现,为“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机制平台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了诸多经验,可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启示。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需要突出相关机制和平台的先导性、专业性、务实性和道义性,着重做好“对接”这篇大文章,把先进理念、先进制度寓于动态对接过程中。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合作体系; 合作机制; 全球治理

作为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会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带

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背景下,有必要梳理总结“一带一路”框架下相关机制和平台建设进展情况,比较借鉴历史上不同类型合作机制的发展经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多合作成果。

### “一带一路”合作体系的基础框架结构

8年来,“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各类合作机制和平台不断涌现。这些机制和平台有的是顶层设计的题中之义,有的则是相关方积极作为带来的“意外惊喜”,共同初步勾勒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的基础框架结构。

第一,两届高峰论坛成功举办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打造了坚实“内核”。第二届高峰论坛比首届高峰论坛规模更大、代表性更强、内容更丰富。各方在领导人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表示“愿同中国进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双边和国际合作,期待定期举办高峰论坛并举行相关后续活动”,“期待举行第三届高峰论坛”。<sup>[1]</sup>高峰论坛机制化,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为凝聚合作共识、指引建设方向、推进合作进程提供最为权威的平台,为合作体系建设锻造坚实“内核”。

第二,200多份政府间双多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这些合作文件是“一带一路”合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合作理念也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

际机制的成果文件。这些合作文件的签署和发布，从国际层面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保证。

第三，一系列功能性机构陆续建立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搭建了诸多实践平台。伴随“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一带一路”冠名的各类合作平台也不断涌现。比如，中国同巴基斯坦围绕走廊建设成立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巴基斯坦议会成立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德国成立“一带一路”倡议联邦协会；英国剑桥大学和兰卡斯特大学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日本成立“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等各类合作平台纷纷搭建。这些合作平台从不同角度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日益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

第四，中国国内政策支撑体系不断完善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注入重要驱动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就相关议题召开会议的方式发挥总协调作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围绕“五通”建设及数字丝绸之路、廉洁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等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建设逐步完善，不断加强协同配合，积极推出相关战略规划和创新举措。各省区市结合自身优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定位日益科学和精准。总体来看，中国国内正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创新发展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体系。

<b>“一带一路”合作体系的基本架构</b>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7年5月14-15日，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9年4月25-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政府间合作机制	截至2021年1月，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国与相关国家政府间对接合作机制。
功能性机制	“一带一路”政党共商机制； 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 .....
中国国内政策支撑体系	国家层面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各部门建立的相关协调机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 多边合作机制历史经验借鉴

“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是开创性的，没有成熟的模式和经验可资参考，但通过比较分析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机制和平台建设的经验，也可以找到一些有益启示。

第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成立，1961年更名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截至2020年4月，经合组织共有37个成员国，并与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建立了伙伴关系。[2]经合组织倡导客观、开放、创新、开拓、道义等价值观，推出经合组织年度报告，定期发布经合组织经济展望、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等研究报告。目前，经合组织的各类研究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评估世界经济发展走势的重要参考，其围绕公司治理、教育、农业、税收等制定的许多行业标准已成为国际通行标准。

经合组织能够形成较大国际影响力，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一是聚焦重点领域。经合组织所有业务基本都围绕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一般不涉及政治、安全等问题。二是锻造核心竞争力。经合组织主要通过发布高水平研究报告提升在发展领域的话语权，强调专业性和知识性。三是注重对外推广。经合组织重视将各类规则标准向国际社会推广，并努力上升为国际通行标准。

第二，世界经济论坛（WEF）。[3]其前身为欧洲管理论坛（德国人克劳斯·施瓦布于1971年创立）。施瓦布起初的构想是打造一个讨论企业管理方法的论坛，引导欧洲公司学习美式管理方法，提出并推广了“利益相关者”理念，倡导企业管理者综合考虑股东、客户、顾客、雇员、企业所在社区、当地政府等各相关者的利益和关切。之后受美元与黄金脱钩等事件影响，施瓦布将论坛主题从管理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领域，开始关注全球经济走势等重大议题。自1979年起，论坛定期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其他领域研究报告，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知识生产中心。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

为世界经济论坛。目前,世界经济论坛自我定位为一个致力于推动公私合作的国际组织,主要功能是汇聚政界、商界等重要领袖,共同制定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

世界经济论坛能够形成重要国际影响力,主要源于以下几点:一是坚持聚焦主题。从初期的欧洲管理论坛到现在的世界经济论坛,尽管其讨论内容有所扩展,但基本聚焦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世界经济热点问题。二是塑造专业形象。世界经济论坛不但定期发布高质量研究报告,而且利用会议场合推出《增长的极限》等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有效发挥了引领国际舆论风向的作用。三是强调客观包容,倡导严谨、系统、客观地认识世界,主动邀请各相关方分享观点,倡导国际社会成员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 “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发展方向前瞻

上述国际机制或平台在历史背景、功能定位、理念原则、性质特点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有明显区别,但其机制平台发展经验对“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一,突出先导性。“一带一路”合作体系需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探索搭建重大工程项目跨国管理体系,打造自由便利的国际投资规则,建设新型国际金融规则体系,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方向。同时,努力激发合作潜力,通过“一带一路”相关机制和平台调动各国企业、媒体、智库、社会组织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注重专业性。“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可聚焦“合作发展



促进平台”这一关键功能定位，通过信息收集和发布推进项目合作。同时，定期围绕经济形势、投资机会、科技发展、安全风险、“五通”建设进展、人文交流等发布研究报告，鼓励各方沟通交流，注重把各方共识以制度和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把先进理念、制度、标准向国际社会积极推广。

第三，坚持务实性。“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应始终与“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建设进程相适应，保持合作体系的韧性和弹性。因此应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大数据库等知识信息载体，发掘各方合作意愿和合作潜力，规避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必要矛盾，解决合作过程中的争端纠纷，确保“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第四，强调道义性。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其中共享建设成果可谓“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共商共建共享和以人民为中心，体现的是中国所倡导的正确义利观和发展观。“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应在推动合作成果更好造福普通民众、保障项目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 “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实践路径探索

无论从服务工程项目建设角度讲，还是从推动全球治理创新发展角度讲，在“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过程中都要努力做好“对接”这篇大文章。通过做好理念、制度、实践等各层面“对接”，不断增强合作体系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持续增进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相容性和耦合性，并始终保持合作体系的精巧性和柔韧性。

第一,以“对接”助力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一带一路”合作体系是在原有全球治理体系基础上做“增量式”改进。为此应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并为全球治理创新发展注入正能量;同时,倡导各方勇于创新,探索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路径,坚持开放包容和公平正义,积极应对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的冲击。

第二,以“对接”增强合作体系内部统筹协调。“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各类机制和平台有些彼此间沟通协调不够,有些存在重复建设问题,有些相互衔接不够。为确保“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发挥机制综合效能,需要着力提升各类合作机制和平台间的协调,确保“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内部运行通畅。具体讲,需要推动各类机制和平台加强沟通对接,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导与自下而上的探索相结合,提升其专业性和实效性。同时,根据“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对各类机制和平台进行规范管理,保证其简洁、精巧、高效。

第三,以“对接”推动与其他合作体系融合发展。目前,“一带一路”已经与全球和地区层面各合作体系开展了广泛对接,[4]中国政府各部门与合作伙伴国相关部门间的合作也日益深入。[5]面向未来,“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可以主动深化与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全球和区域合作机制对接。对接领域可以涵盖发展思路、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价值体系、风俗习惯、工程项目等,进而实现全方位发展。

第四,以“对接”确保合作体系建设与时俱进。“一带一路”合

作体系建设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需要保持开放性和灵活性，为合作体系自身改革发展预留空间。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的国家会推出新的发展构想，有的国家为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甚至专门推出新的发展规划，“一带一路”合作体系需要为与这些新的合作规划对接预留“端口”。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将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会给一些领域带来“颠覆性”变革，进而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也需要对这些重要发展变化保持敏锐性。再如，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国际社会只有协调合作才能有力解决，“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也应对这些突发性议题进行及时有效应对。

总之，“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建设是一项宏大的历史实践，相关各方需要携手努力，持续创新合作理念，提升合作效率，共享合作成果，共同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美好的未来。

---

[1] 《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新华网，2019年4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7/c\\_1124425237.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7/c_1124425237.htm)。

[2]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www.oecd.org/about/history/>.

[3]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

[4]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提到的地区性合作机制或合作规划主要有：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总体规划（2019—2023）、非盟及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阿拉伯国家联盟、东盟及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东盟智慧城市网络、东盟“链接互联互通”倡议、亚欧会议互联互通工作组、东盟东部增长区、中亚互联互通倡议、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

体、迪拜丝绸之路战略、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中欧互联互通平台、欧盟东部伙伴关系、欧亚经济联盟、欧亚伙伴关系、中非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全球集团倡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美洲国家组织、太平洋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地中海联盟及其他次区域和区域合作倡议。参见《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7/c\\_1124425237.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7/c_1124425237.htm)。

[5]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新华网，2019年4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8/c\\_1124425293.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8/c_1124425293.htm)。

UDK 616.98:578.834]:339.9

327::911.3(510)

专业报告

投稿 09/06/2021

收稿 29/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687

#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新发展格局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丁一凡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巨大,美欧发达国家受疫情牵连,经济严重下滑。尽管它们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体经济并未因此走出衰退,并且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泡沫”。疫情在发达国家造成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延续多年。部分美欧国家政府采取强硬的国家干预手段,管制企业的投资与贸易行为,逼迫企业与中国“脱钩”。基于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中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强调主要依靠“内循环”维持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发展以我为主的“外循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关键词】**世界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双循环;“一带一路”倡议;新发展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尽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但这些非常规的经济政策难以支撑中长期的经济复苏。与此同时，由于采取了科学严格的防控举措，中国得以快速控制住疫情并较早实现复工复产，成为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大环境中逆势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担忧、嫉妒等复杂心理的影响下，部分美欧发达国家呼吁与中国“脱钩”的声势不减。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必须明确自身需求，坚持本国的国际发展战略，避免被外部势力干扰。

### 疫情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方向

疫情之下，曾经作为欧美国家经济政策指导方针的“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国家干预主义悄然回归。

第一，西方经济学界开始远离新自由主义并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界不断出现重新回归国家干预主义、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声音。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却批判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采取类似的产业政策保护本国产业，甚至指责产业政策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腐败和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讽刺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经济表现较好的德国，正是依靠产业政策才维持了本国的制造业优势，并得以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

第二，美欧国家不断运用法律手段加强贸易保护主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严苛审查；二是直接制定相关法律，阻止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正常的市场收购兼并行为。西方国家濫用法律手段特别是大幅提

高关税，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或将导致全球性的贸易集团大战，最终或引发全球经济陷入大衰退、大萧条的境地。

第三，动用国家财政力量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尽管美欧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持他们资助那些陷入流动性枯竭和资不抵债困境的企业，但其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推动本国央行买入国家债务，以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此外，为避免关键产业落入外资之手，一些欧洲媒体甚至宣扬将部分企业国有化，以加强对相关产业的保护力度。

### 发达国家借疫情加速与中国“脱钩”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率先复工复产，并向包括美欧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资。然而，美欧国家部分政客持续利用疫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甚至无端指责中国利用“口罩外交”谋求扩大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这些极右翼政客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与所谓维护“国家安全”进行捆绑，叫嚣在经济上加快与中国“脱钩”。同时，疫情使得美欧国家意识到自己在医疗器械、药材原料等与防疫有关的物资方面过于依赖中国。为降低被“断供”的风险，相关国家在上述领域不断加大对本国企业的投资力度，意在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

当前国际局势表明，美国已经不再坚持尊重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的原则，更加表现出以国家强制力干预市场的大政府主义和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霸凌主义。虽然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美国政府依然坚持冷战思维，采取长臂管辖的方式，推动美国企业及其他应用美国技术的企业对中国技术出口制

造障碍，旨在持续打压中国。然而中美仍然互为重要贸易与投资伙伴，因而美国对华发起的所谓“新冷战”不可能成功。在美国执意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美国获得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机会也在减少，其构建新供应链的成本也会增加，未来美国很有可能再度陷入经济“滞胀”。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正在由原来扁平的供应链向地区化发展。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东亚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国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自身的投资战略与产业链方案，然而，相关企业考虑到中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无法舍弃庞大且成熟的中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下降了约40%，但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仍在增长。这些数据表明，即使跨国公司希望通过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来分散风险，中国仍然是世界市场中不可忽视的投资目的地。

###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断成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步推进，这使中国迅速地参与了全球化，大大提升了中国工业化的速度与水平。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产出与商品出口总额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增长。可以说，世界经济的开放及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大幅下降，但中



国转而依靠自己庞大的内部市场来维持经济增长。在相关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下，中国依靠对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对消费市场的刺激，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分布最齐全的经济体。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中国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唯有中国有能力及时向全世界提供亟须的各种医疗及其他生活用品。2018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日本及德国三国的工业产值之和，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因此，部分西方跨国公司撤出中国并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反而会给中国自己的企业腾出更多空间和更大市场。此外，疫情暴发后中国表现出的韧性、组织能力与恢复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西方跨国公司非但没有撤离中国，反而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

### 中国开启“双循环”为未来发展护航

考虑到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市场的美欧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控制住疫情，其经济也将持续在低位徘徊，中国需要改变包括出口结构在内的经济发展结构。为应对当前国际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一方面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技能与收入，增加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健全中国的自主产业链，重视培养自主的产业生态，防止因受制于人而陷入被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

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实现新形势下的外循环也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不仅要在全球产业链中继续保持重要地位，还要进一步向全球产业链的上游攀升。新时期的外循环既要考虑中国市场如何高质量地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引进来”，也要考虑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应该看到，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还是中国为应对“逆全球化”所作的提前筹划。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政府与众多外国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本身就代表了中国版的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项目是让市场与政府都深度参与的世纪工程。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培育市场是本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成为经济危机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部分政客为了制衡中国不断崛起的影响力，加大对非洲和中亚等国的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投入，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直接竞争，甚至开动宣传机器，极力抹黑“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成果，煽动部分沿线国家民众破坏“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疫情期间，东盟国家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凸显了中国外循环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有了更大的“朋友圈”，中国的工业产能就会得到充分释放，这不仅能够提高中国投资的效率，还能扩大市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

UDK 330.341.2:339.9(510)  
339.9.012.23  
专业报告  
投稿 09/06/2021  
收稿 23/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691

# 历史进程中的国际经济制度与中国的角色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 巍



**【内容提要】**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较早可以追溯至二战结束之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此后70余年来,在贸易、金融与投资等不同经济领域,以及在全球与区域等多个层次上的国际经济制度不断新建、改革与进化,形成了当前国际经济制度林立的景象。在此期间,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中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渐进式变化,总体上经历了从旁观者、融入者、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中国角色的演进既是促成国际经济制度变迁的原因,反过来也是国际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二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在国际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中国的角色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关键词】**国际经济制度; 制度变迁; 制度战略; 中国角色

国际经济制度是中国开展经济外交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制度建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以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代表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成立，正式开启了国际经济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也奠定了此后制度变迁的基础。而伴随着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发展，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发挥的作用也不断演变，这既是中国基于对自身实力与国际形势的判断而主动作出的战略选择，也是国际经济制度变迁的客观要求或必要条件。

### 国际经济制度的兴起与中国的旁观性角色

从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正值国际经济制度的初创时期，中国在这一阶段参与制度建设的积极性并不高，在其中主要扮演的是“旁观者”的角色。

在二战结束之际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最早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制度体系，它确立了战后资本自由化、外汇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全球经济治理原则。该体系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支撑，并辅以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它们对于维持战后全球金融与贸易秩序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实力成为整个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核心，在制度建设与规则制定方面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原则（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与固定汇率制。相比较而言，此时中国国内“百废待兴”，其所奉行的自给自足和国家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决定了中国对于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不具有较强的实力支撑与迫切需求。与此同时，受“冷战”影响，世界大多数国家被划入界线分明且针锋相对的东西两大阵营。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空间极其狭小，其有限的经济外交也仅限

于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互助关系,以及对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而冷战对立的意识形态也催生了中国对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制度的排斥心理。

基于此,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这30年间,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积极性并不高,一直作为“旁观者”游离于这些制度之外;直至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以及确认上述国际经济制度对于改善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重要意义后,中国才开始主动为恢复在这些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做出外交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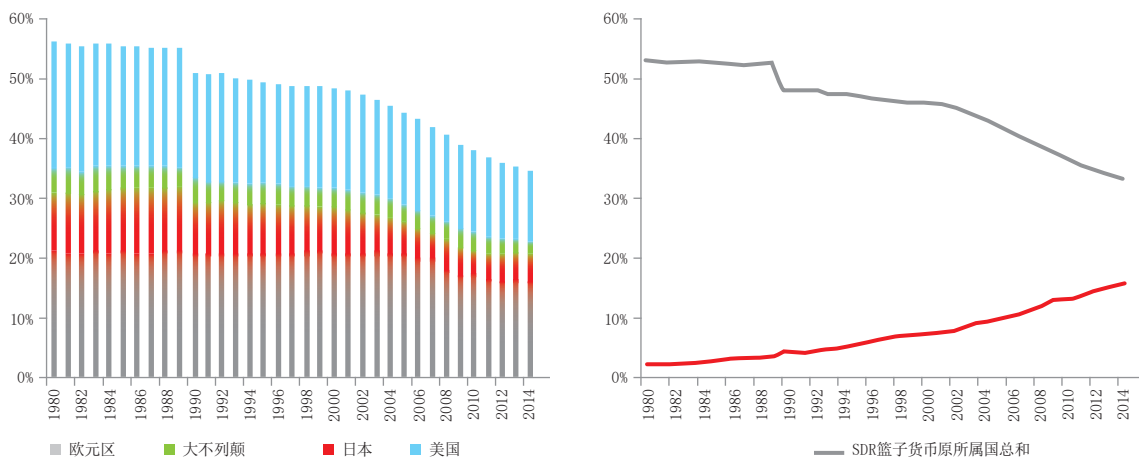
### 国际经济制度的发展与中国的融入性角色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关贸总协定三大制度发展的日趋成熟,以及在区域层次新国际经济制度的不断涌现,中国开始对参与国际经济制度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并主动寻求融入既有的国际制度体系,开始或重新申请加入各种国际经济组织。

1980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间,中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在世界银行及其所属机构中的席位,开启了中国金融外交的新篇章。如图表1所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国重新加入后随即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1981年起,世界银行也开始面向中国贷款,并逐步推进双方在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以此为起点,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框架下开展经济外交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比如在金融领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层次开始由全球层面延伸至区域层面。1986年,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会员国,还

于次年的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改选中当选为董事国并获得单独的董事席位。在贸易方面，中国于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交复关申请，并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复关以及后来的入世谈判。此外，中国还突破了过去经济外交的局限，开启了双边层面的制度建设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全面放宽对华技术管制，同时对华技术出口转让也大幅增加的背景下，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于1983年正式成立。该制度是两国在经贸领域最早建立起来的外交对话机制之一，也成为此后中国在双边层面开展制度建设的有效“模板”。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实力有限，对国际经济规则尚不熟悉，中国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参与主要表现为规范自我、融入其中。但通过一系列接触性经济外交活动，中国进一步了解了各种国际经济制度的运作规则，初步培育了在经济外交中运用制度战略的意识与能力。

图表1： SDR篮子货币所属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重要性逐渐降低，而中国不断抬升



图表来源：《SDR之后何去何从》，

<http://usstock.jrj.com.cn/2015/12/10222020220163.shtml>。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更加坚定和积极地寻求融入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表现为主动学习和融入既有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并开始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一方面,中国参与和融入区域性国际经济制度。中国于1991年应邀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并于1993年参加首届峰会,从此开启了在APEC框架下的各层次经济合作,APEC成为中国在亚太地区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平台。1997年,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在经济全球化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中国积极参加该机制各个层次的对话活动,并推动该机制走向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谈判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复关”和“入世”进行了长达13年的外交谈判,其中最主要的是中美双边经济谈判。最终,中国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新纪元。“入世”谈判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与适应国际贸易规则的机会与过程,成功塑造了此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所坚持的自由贸易的基本立场与理念。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对参与国际经济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学习”特点,即为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不断学习“游戏规则”,为此后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 国际经济制度的壮大与中国的参与性角色

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正常成员,也成为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中国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一步熟悉,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水平或运用国际经济制度战略的能力进一步增

强；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期待也与日俱增。在这一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融入性角色逐渐转变为创造性、参与性角色。

首先，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层面的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必须尽快从“入世”过渡期中的适应状态转变为积极参与的状态，以推动形成国际经济体系中更加公平合理的新规则和新制度。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展现出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的维护者和践行者的形象。在全球金融治理中，2008年国际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推动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会议，并在其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其次，中国在区域层次推动自由贸易区（FTA）建设，同时积极推动建立东亚区域金融秩序。2000年，中国首次提出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的构想；2010年，该自贸区正式建成，成为当前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该自贸区的谈判与筹建过程中，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受危机冲击的东盟各国给予大力支持，东盟国家由此产生了对区域合作的信心，这极大地加速了CAFTA的建设进程。此外，2003—2004年间，中国在东亚系列峰会的多个场合中提出建立东亚自贸区的构想，这也成为2011年东盟第19次峰会最终决定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重要源头之一，该自贸协定也是当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最受瞩目的区域性国际经济制度之一。

在区域金融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积极参与“10+3”机制下的清迈倡



议。这份关于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实质性地促使地区资金救助机制得以形成，并已成为东亚乃至亚洲国家在金融货币领域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以地区合作为起点，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金融管理经验的累积，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中逐步超越参与性角色，开始更多地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经济领导力。

### 国际经济制度的变革与中国的引领性角色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外交的领导者之一。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所累，美国和欧盟的传统领导地位遭到削弱，中国由于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国际经济外交舞台上开始成为与美欧并驾齐驱的三大领导者。而这种领导性地位在2013年之后更加明显，并主要表现为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中引领性作用的日益凸显。

第一，引领创建新制度与改革旧制度。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大国建设国际制度意愿有所下降，中国则主动承担起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责任，积极引领创建了诸多国际经济机制。在周边地区，中国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孟印缅经济走廊”与澜湄合作等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其中澜湄合作机制自2016年成立以来，在短期内已发展成为中南半岛乃至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成效最为显著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之一。在全球或亚太区域层面，中国倡导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动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等既有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与区域金融治理中的垄断地

位。中国创建新制度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将其发展成为常设性的国际会议制度。论坛的成功举办与不断发展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愈发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支持与参与。

此外,中国在推动既有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上,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联手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增加上述国家的份额权与投票权。同时,通过外交交涉等多种手段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同意对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进行扩容,将人民币纳入其中。在推动世界银行变革上,中国推动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争取更多权益。在较为复杂的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题上,中国坚持改革必须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坚持“所有制中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传统立场,主张以发展为核心,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立场一致;在争端解决方面则主张尽快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并对上诉机构的权限予以必要澄清和限制等,这与除美国外的大多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观点相同。基于上述立场,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并与欧盟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展开积极沟通与联合行动等。但总体来看,由于成员立场分歧严重,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目前仍处于困局之中。

第二,在国际经济制度平台上主动发起议题。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前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替代现行的“单一国际储备货币”,提出应提升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并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2016

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正式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对美经济外交中，中国提出在美外汇资产安全问题以及投资保护主义问题。这一系列改革和合作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制度中的议题领导者。

第三，积极向国际经济机构输送人才。在贸易领域，中国原常驻世界贸易组织总代表易小准成为首位来自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在金融领域，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发展中国家人士首次出任这一要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成为首位中国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在农业领域，中国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在2019年成功当选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总干事，成为首位FAO的中国籍总干事。中国面孔在多个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中亮相，打破了欧美国家对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领导权的垄断地位，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经济机制中发挥领导性作用的认可和期待。

第四，参与并引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在环境和气候外交中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认同，并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一项重要原则。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提出要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反对美国式的放任自由，成为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共同基调。此外，上文提及的中国引领创建的诸多国际经济制度，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也包含了在国际规则上的创新，这些机制实际上打破了现行由欧美日等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与经济治理格局，建立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引领的一套新型国际金融与经济规则体系，并形成当前两种规则体系共存的局面。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经济制度的变迁日趋多元化与复杂化,并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构建中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中国的角色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这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前者表现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正在显著提升,后者主要包括中国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在增加,以及来自其他大国的战略竞争压力逐步增大。

UDK 364.662-78:316.43(100)  
339.9.012.23  
专业报告  
投稿 09/06/2021  
收稿 30/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696

# 中国脱贫攻坚成就的世界意义

《当代世界》杂志社记者、编辑, 法学博士 甘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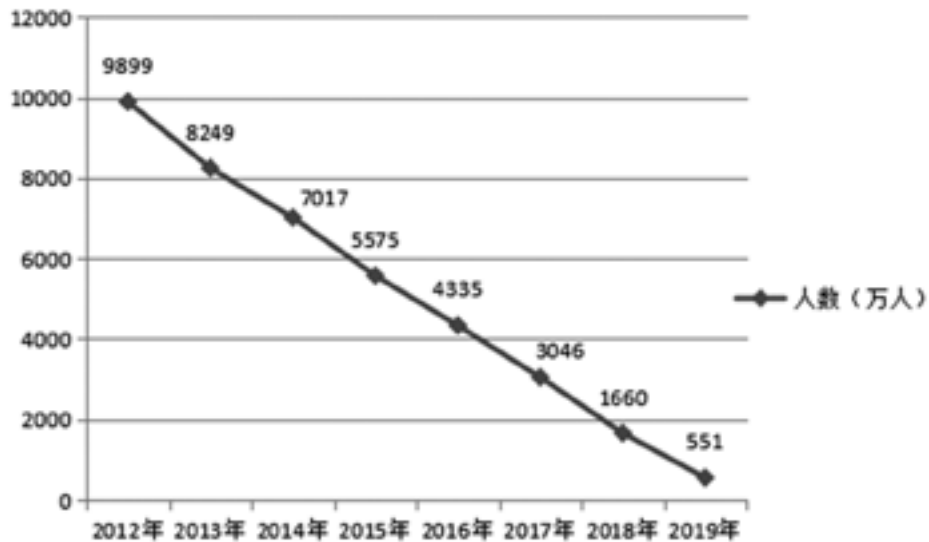


2021年2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个伟大胜利和伟大光荣不仅是亘古未有的一大奇迹, 而且是全球减贫事业的一座丰碑, 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为世界摆脱贫困分享中国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创新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表彰大会上进一步将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和认识归纳为“七个坚持”

，不仅对我国构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极大丰富了人类减贫理论，为全球减贫治理和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外国政党政要、智库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减贫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和制度体系，这是人类减贫经验的丰富宝藏，可对世界各国摆脱贫困提供有益借鉴。非盟和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中国脱贫攻坚经验对非洲来说非常重要，中国不仅是朋友更是榜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图1：中国贫困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图表由笔者根据中国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绘制而成，参见：<http://www.cpad.gov.cn/col/col2355/index.html>。

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中国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这些理念不仅指导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且从实践层面为解决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致力于国内减贫事业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减贫治理，通过“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东亚减贫示范合作项目”等多层次交流合作机制分享中国理念与做法。2018年第73届联大通过关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决议，将中国倡导的精准扶贫理念与实践写入其中。在2020年“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国际理论研讨会上，外宾们一致表示，中国智慧和方案为推动世界减贫事业和全球减贫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的脱贫攻坚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无疑给人类减贫事业提振了信心。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减贫国际责任，通过提供援助、减免债务、扩大进口等多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旨在探求与世界

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世界银行报告显示, 共建“一带一路”将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巴尔塞纳表示, 过去70年, 中国始终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 积极开展南南合作, 中国的脱贫攻坚大大加速了世界减贫事业发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中国将始终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和国际合作精神, 在百年大变局中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扎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不移地做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 为创造一个没有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UDK 327(510:73)  
327(510:4-672EU)  
评论文章  
投稿 09/06/2021  
收稿 18/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694

扎尔科·奥布拉多维奇 教授<sup>1</sup>  
贝尔格莱德大学  
安全学院

# 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超）权力要素



## 摘要

中国国家存在五千多年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它始终是一种特殊的文明遗产，对亚洲人类社会有着显著的影响。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新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以其经济实力和具有国际性的发展项目（其中“一带一路”作为最重要的）从亚洲“踏入”全球舞台，成为全球发展理念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维护人类未来而进行的国家间合作。本文试图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的发展要素，特别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成效，这使得中国成为大国权力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国家态度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现在，进入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

---

1 obradovic.zarko60@gmail.com

国家, 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因素、综合因素和组织因素, 就不可能在组织社会和国家、推动新的发展思想和实现既定目标方面取得这样的成果。中国国家在活动中, 升华了中国过去的经验, 提升了国际社会对当下的认识, 升华了中国公民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国家稳定发展的需要。美国和欧盟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反对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 考虑到它们的利益, 维护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但同时, 如果可能的话, 也不损害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水平。

**关键词:** 中国、全球力量、“一带一路”、美国、欧盟、州际关系

## 介绍

在近代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在短时间内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飞跃。自1949年成立至今, 70年来, 中国公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与全国(公路、铁路、航空)联网, 技术进步, 成为世界领先国家之一, 经济强, 军队强, 政治影响大。过去十年里, 世界上几乎所有创新的东西都来自中国。但除了一切新的东西, 都是现代中国身份的一部分, 国家的过去、传统和历史都没有被遗忘。中国成功地把历史与现在、旧习惯和新欲望、孔子思想和现代生活联系起来。换言之, 现代中国成功地改变了全社会的许多事物,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仍然是五千年来中国历史悠久的国家、传统和价值观的一部分。在国际一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各种多边发展项目, 包括“一带一路”倡议, 成为区域和全球社会发展的发起者。

同时倡导各国，主要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联合行动，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国在面对全球挑战和问题时达成协议，都符合人类共同未来的利益。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14.43亿，占世界78.68亿总人口的18.34%。继中国之后，印度的人口最多：13.92亿，其次是美国，人口为3.27亿，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巴西、孟加拉国、俄罗斯和墨西哥，这些国家的人口都比中国少得多（联合国，2019年）。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联邦和加拿大，领先于美利坚合众国），是亚洲第一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政治影响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自联合国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多边组织（1945年）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其政治意义和影响也随之增强。我们认真监测、分析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他各种全球性问题的看法。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它支持联合国作为“最普遍、最具代表性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促进和平和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的多边舞台”的工作（“多边主义很重要”，2020年）。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坚持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切重大问题，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其他重大问题（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或应对现代安全挑战），应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

在经济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领先的国家之一，很快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4.7万亿美元。20年前，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2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在20年内增长了12倍以上。<sup>2</sup>中国领先于美国，美国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万亿美元。过去二十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像中国那样“跳跃”，因为2000年达到10.25万亿美元。据专家称，美中两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将迅速缩小，这一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加快。除美国、中国和日本外，世界十大主要经济体还包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韩国。

据《财富》杂志报道，中国企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企业中的代表性数据证实了中国经济实力在21世纪的迅速崛起及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联系进程的能力。2000年，在全球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只有两家公司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排名第58位）和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排名第83位）（财富杂志，2000年），当然，数量最多的公司来自美国、日本和德国。<sup>3</sup>十年后，在中国最大的200家公司中，有14家公司，其中美国60家，日本26家，德国16家，其余84家公司分别位于不同的国家（财富杂志，2010年）。一年前，即2020年，这一数字的四分之一（50家公司）已经跻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200家公司之列，而美国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数量（60家公司）。有22家公司来自日本，10家来自德国，其他58家公司来自世界其他国家（财富杂志，2020年）。21世纪

---

2 引用人：<https://www.inf.org/en/Countries/USA#Countrydata>（摘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2021年5月26日查阅，中国统计局称，1993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实际年均增长率（以百分比计）为9.57%。2003年至2010年年均增长10.15%。随后几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略低（2011年9.2%，2012年和2013年7.7%，2014年7.4%，2015年6.9%，2016年目标增长率在6.5%和7%之间，2017年为7.1%）。根据Jankovic 2017年，第48-54页；Manchang, 2018，第10页。

3 详见：同上。1999年，142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这三个国家设立了总部，这一事实证实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经济在20世纪末的全球霸权（即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实力）。引用人：Steger, 2005年，第45页；Kilibarda, 2008年，第208页。

头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数量的增加（从世界上最大的200家公司中的两家公司增加到50家）最能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的实力、多样性、技术、组织和发展能力，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强，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据2006年以来一直发布国家武装部队年度报告和排名清单的全球火力网站显示，202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排名榜139个国家中，是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各国的军事实力是根据一项指数计算的，该指数包括50多种不同因素（不仅根据士兵数量和不同武器种类和数量计算军事实力，而且还包括财政状况、后勤能力、地理条件等）世界军事排名，（2021）。美国仍然排名第一，实力指数为0.0718（指数越接近于零，该国的军事实力就越高）。第二名是俄罗斯联邦（权力指数为0.0791），第三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指数为0.0854。<sup>4</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实力无疑是二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的许多倍，这是中国全面发展和投资发展军事力量的结果。其他国家落后于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表现是，印度的实力指数排在第四位（指数0.1207），其次是日本，第五位（实力指数0.1599）和其他国家。

## 一带一路倡议

于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sup>5</sup> 和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预算（1780亿美元）比美国的预算小，但比俄罗斯的预算大。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现役军队（218.5万人），还有3260架军用飞机、3.5万辆装甲车（包括3205辆坦克）和770艘军舰，其中包括两艘航空母舰（2021年世界军事力量新排名）。

5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哈萨克斯坦）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在2100年前的汉朝，和平与友谊使团连接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并开始连接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的丝绸之路。详见：Jinping, 2014年，第315-319页。

亚<sup>6</sup> 期间推动了“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以在不同的领土和海洋方向(继前丝绸之路)连接亚洲与非洲和欧洲。“一带一路”代表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发展战略,对参与国和国际社会、世界和平与安全都具有深远的积极经济和政治意义。呼吁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方面开展合作,这一呼吁已发送给所有在这一大型项目的领土和海上路线上的国家。<sup>7</sup> 各国在单边关系和区域一级的合作与联系范围非常广泛。“一带一路”除了共建各种基础设施项目(铁路、公路建设)外,还包括港口建设、能源领域项目(天然气、石油、能源基础设施)、信息通信设施建设、自贸区网络建设等,促进相互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环境保护、教育、科学、信息、文化、卫生、旅游、人类交流等方面的合作(Office of the Heading Group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7年,第18-48页)。“一带一路”倡议的质量也是它的包容性——对每个希望参与项目合作和实施进程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因此没有任何人(即任何国家)有义务加入这一倡议)。在执行这项倡议方面的合作为所有参与者,即国家及其公民提供不同类型的福利。

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多,印证了“一带一路”的巨大重要性。除中国外,“一带一路”倡议途径64个沿线国家,将亚洲、非

---

6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尼时强调,中国有意与其他国家发展海上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详细信息:同上,第320-324页。

7 考虑到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旧方向(路线),中国确定了“一带一路”内的五个方向——三个“陆地”和两个“海上”。其中一条航线从中国西北部和东北部出发,经过中亚和俄罗斯,到达欧洲和波罗的海。第二个方向,从中国西北部到波斯湾和地中海,途经中亚和西亚,第三个方向连接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到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经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另一条也是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经过南海,延伸到南太平洋。引用:Office of the Heading Group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7年,第18-19页。

洲和欧洲三大洲联系在一起（陆地和海上）。<sup>8</sup>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面积51491201平方公里，沿线人口44亿多（世界银行，2021年）<sup>9</sup>，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有兴趣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不断增多。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派代表出席（Obradovic, 2018年，第159页）。第二届论坛于2019年4月在北京举行，140多位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Brkic, 2019年）。尽管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Beta, 2020），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数据仍然显示了“一带一路”在双边和全球的广度和重要性。根据数据，中国与138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1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许多国家和地区组织支持开展“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同意将本国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Obradovic, 2016年，第84页）。联合国也认识到“一带一路”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支持这一项目。

2013，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全球发展计划，是中国倡导的发展理念在国际层面的体现，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国际经济流动的能力及经济全球化。2017年1

---

8 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除了中国之外，还包括亚洲（中国）和欧洲之间地区的另外64个国家，包括非洲部分地区。来自中亚的“一带一路”成员国除俄罗斯、蒙古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和缅甸。来自南亚的成员有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在欧洲，“一带一路”包括波兰、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16个国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进程成员国）。来自西亚北非的“一带一路”成员有：伊朗、叙利亚、约旦、以色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和也门。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也来自中欧和东欧（Wang, 2018年，第76页）。

9 详见：Obradovic, 2018年

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明确提出了中国的这一立场。<sup>10</sup> 当年十月底，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百周年之前，“进一步”实现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和目标。他概述了中国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两步走”发展计划。在这一发展阶段结束时，除了要实现的许多其他目标外，中国还应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全球领导者（Xi Jinping, 2017年，第25页）。

###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球健康事件，中国在抗疫过程中被证明是一个负责任、组织良好和高效的国家。它是各国中第一个控制疫情蔓延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经济复苏并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从美国向中国转换这一不可阻挡的“经济力量转型”进程已经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一套先进的健康码系统，用于监测人员流动情况。这些系统跟踪了新冠病毒的传播情况，并采取了封闭地区或城市的措施，而不论其大小或人口。<sup>11</sup> 对病毒传播的控制也

---

1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并指出“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选择。”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习主席说“必须有实力在全球市场的浩瀚海洋中畅游”。因此需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并加以引导，分摊其负面影响，确保“其利益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习主席通过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行动方式，实际上是在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它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的地位，以及进一步加强这一地位的意图。习主席认为，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以“适当的方式”管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实现其积极发展（因为经济全球化也有消极的后果（扎尔科·奥布拉多维奇的评论）。中国的意图是顺应“大势所趋，从具体国情出发”，以“适当的速度”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最终目标是在“效率与正义”之间取得平衡，以确保“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人群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Jinping、贝尔格莱德、2019年第71页）

11 中国有能力迅速作出反应，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流并封闭某些地区。山东省青岛市的例子证实了



有助于增强公民在佩戴口罩和遵守流行病学措施方面的高度纪律性，以及当局严格监督控制既定措施的执行。

在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旨在恢复生产和刺激出口的经济措施<sup>12</sup>，取得了成效。国内生产的恢复也是在华生产或经营的外国公司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工作和投资的一个信号（详见：Obradovic, 2020a）。有鉴于此，中国恢复了生产，重启了发展势头，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该组织特别指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2020年经济增长率应为1%的国家（Vujic、2020年）。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达到2.3%。对于2021年，中国的国家生产总值增长预测更高，达到6%，而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年度经济增长将达到8.1%。<sup>13</sup>中国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下的增长，相对于其他国家经济的衰退，特别是相对于美国而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美中经济关系变化以及自由主义社会经济组织模式局限性的众多评估。许多经济专家的结论是，“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理念正在瓦解，并其中的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转向”（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经济末日，2020年）。法国《世界报》评价说，“二战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已不适应21世纪大国关系的现实”，“中国的力量撼动了整个体系”（中国的力量撼动了整个体系，2020年）。弗朗

---

这一点，该市记录了12例当地人口中的病毒传流病例，因此在随后大约7天时间内检测了1000多万人（M. A., 2020年）。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度关注外贸政策，其目标为“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有助于恢复生产的措施被提供给“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并保持了供应链的稳定。为此，政府通过提供“出口信贷”来支持主要出口公司。引述自：中国正在努力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双重胜利，2020年，第8页。

13 引用自：2021年4月27日，贝尔格莱德，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在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对华友好议员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西斯·福山（自由民主社会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发现自己的这段时期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丧钟，这一时代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和撒切尔。”（Lalic、2020年、第8页）。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尔也对这一流行病影响下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作出了评估，强调“有迹象表明，亚洲正在从美国手中接管全球权力中心的角色”。这可以被视为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时刻（2020年：权力更迭发生在我们眼前，202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承认了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称“中国已成为主要经济大国”（Mitrinovic，2020年）。与此同时，默克尔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未来，进而间接地对中国社会经济组织模式的优势表示关注，呼吁欧洲国家“对中国采取共同立场”，制定反映“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Mitrinovic，2020年）。

通过恢复生产和增加出口，中国除了稳定各公司（和国家）货物和原材料的供应链，从而稳定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还能够向各国输送大量医疗设备和物资。此外，通过视频会议和线下访问的方式，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分享了他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帮助采取必要措施防治这一流行病和治疗感染者。对许多国家来说，这对防治这一流行病提供了重大帮助。塞尔维亚是接受医疗援助和中国医生访问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取得的成果，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新作用，客观上离不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用。在过去100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反对党到执政党，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道路，成功地抵御了伴随着中国人民和国家，进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无数诱惑。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最

大、最强、最具领导作用的左翼政党。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和项目，不断致力于使中国变得完整和强大；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寻找比现有解决方案更好的新的解决方案；以创新、务实和决心伴随其工作，良好的组织，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不断检查目标的实现情况；建立和使用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彻底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之成为一个发达和强大的国家。

在许多人物和事件中，毛泽东脱颖而出，这些人物和事件既是党的身份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的一部分。他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反对党的困难时期领导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他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和首任领导者。第二个是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这一举措使中国变得更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习近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进一步加强延续和发展了中国的政策，使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社会的全球流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重大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和文明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成为全球发展的载体（火车头），而且成为影响众多全球事件和进程的国家。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国家。

### 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一级的力量增长引发了美国和欧盟的反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布期间，2017年12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数月后），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评价说，“中国（除俄罗斯外）是一股修正主义势

力,是一个试图挑战美国力量、破坏美国安全与繁荣的竞争对手” (Obradovic、Stanojevic、Jeftic, 2019年,第84页)。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确认了中国作为美国战略对手,在新军事战略中,美国将中国(除俄罗斯外)列为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应予以反对 (Obradovic和其他的,2019年,第84页)。在美国政府的主要代表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自由秩序被打破” (Obradovic等,2019年,第84页)。通过各种措施,美国很快对中国从言行到行动都发生态度转变。美国对一些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开启了对华贸易战。与此同时,加强了就中国在南海实行军事化,关于香港和台海局势,关于在新疆侵犯人权等议题对中方的指控,并将其作为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的基础。一场与中国通信技术公司的技术战也已打响。2019年,通过了一项“保护美国通信网络”的法律,根据该法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禁止美国公司从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购买设备,因为这些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2021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后来扩大了对“国家安全、通信网络”构成威胁的中国公司名单,除了华为和中兴通讯外,名单中还包括“海能达通信公司、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达豪科技”等(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多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公开指责中国储存并传播了一种新冠病毒,声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一说法(Kavaja, 2020年,第1-3页)。美国并没有就此止步,对中国的指责也没有随着拜登总统领导的新政府而停止。年初,拜登与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四方安全对话视频峰会。尽管峰会与会者没有提到中国,但以美国为首的与会国建立一个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印

太地区利益的联盟的意图是明确的（拜登聚集联盟，2021年；给北京一巴掌，中国人愤怒，2021年）。由8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挪威、瑞典、德国和澳大利亚）代表组成的各国议会联盟也是反对中国阵线的一部分。该联盟的目标是“建立适当和协调的应对措施，并希望对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作出积极和战略性的反应”（各国议会联盟，2020年），即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与美国不同，美国在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政策（对来自中国的货物征收关税、禁止某些中国公司、对中国官方政策的各种指责等），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更为复杂、温和，但不可否认的是，针对中国的批评声调和实际措施也越来越多。欧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盟“遵循”其最重要的战略、安全、政治和经济伙伴美利坚合众国的政策。同时，它力求尽可能少地破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实现的经济合作水平，欧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互关系自2007年以来一直被定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Babic、2010年）。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几十年来不断完善，到2020年，中国成为欧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超过美国）。欧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一部分是中国与17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17+1合作），自2012年以来一直存在，有12个欧盟成员国参加。<sup>14</sup> 近年来，这些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领导下，在各个领域启动（并实现）了大量的项目（Zuokui, 2016）。在布加勒斯特、杜布罗夫尼克、里加、索非亚等欧盟成员国举行了几次合作机制（17+1）首脑

---

14 参加17+1合作进程的欧洲联盟成员有：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立陶宛同时表示打算退出17+1进程）。

会议。这种合作不仅是中国与欧盟关系的一部分，也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因为17+1合作机制（意味着欧盟成员国的领土）是中国倡议的西方方向。<sup>15</sup> 欧盟和中国签署了多项文件，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指欧洲）纳入欧盟成员国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创造了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欧盟主要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 - 还是欧盟成员国时，等）正在努力拓展与中国经济合作的范围和内容，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互访（2015年习主席访问英国、2018年马克龙访问中国等），并签署了大量具有经济意义的合同。

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欧盟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也出现了降温时期，主要原因是欧盟对中国一些内部问题，如“人权”的评估。近年来，欧盟对中国国家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与香港、台湾、新疆等有关）。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行政措施，欧盟试图控制和减缓中国企业在整个欧洲，甚至包括巴尔干半岛的活动（布鲁塞尔在西巴尔干地区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折磨，2021年，第2页），以及某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sup>16</sup> 此外，在欧盟一级发起了一项倡议，通过一项法律，禁止“由第三国的国家补贴公司从欧盟并购企业”（Avakumovic、2021年）；是否正在制定针对中国公司的法律？（2021年）。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公司，但很明显，这项禁令适用于中国公司，特别是在欧盟（如德国）的一些公司对中国公司收购国内公司提出了严重批评之后（Obradovic、2018年，第165页）。一些欧盟成员国，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受美国影响或独立），决

---

15 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进程中的合作内容，详见Obradovic，2018年

16 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重建和建设项目匈牙利境内部分推进速度较慢，因为欧盟要求匈牙利在宣布公开招标选择将实施铁路建设项目的公司时遵守欧盟的规定。

定引入“新的5G安全规则”（I.S.M, 2020年）。此外，法国、丹麦、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已采取措施减少华为在5G网络中的业务，瑞典也对华为的部分网络（即中国网络）实施了禁止使用中文套件的禁令（I.S.M., 2020年）。结束与中国公司合作的压力具有更广泛的层面，罗马尼亚核电公司的案例证实了这一点。罗马尼亚政府迫于美国和欧盟的压力，向该公司发出了暂停与中国合作伙伴就建造两座新核反应堆（除了现有的两个）进行谈判的请求。（美国通过罗马尼亚停止了中国的“一带一路”，2020年；Obradovic, 2020b）。欧洲领导人毫不犹豫地指责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隐瞒了有关新病毒的信息，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这样做了，他说“北京并没有完全公开疫情的规模”（Kavaja, 2020）。

很明显，欧盟在遵循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但也要注意（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国家和中国企业的批评和采取的措施不要超过“批评的可接受限度”。因为欧盟无疑会从中国受益，那些批评会危及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 结论

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已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对国际社会的一切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各领域联系国家、经济合作、倡导世界和平与安全、各国共同关心人类未来等，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运用和推动的原则。“一带一路”倡议以最好的方式体现了所有这些价值观。因此，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在许多第三国不仅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而且是一个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在国际社会中提出

了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新概念和人类社会发展价值观的新体系的国家。美国在过去十年里把中国视为全球对手，并采取各种措施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和影响力。美国对华贸易战，美国禁止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电信设备，并要求其他国家停止与同这家公司合作的运动，都只是美国如何看待对华关系的一些例子。欧洲联盟（即欧盟成员国）越来越多地批评中国（如由于新疆的人权状况、香港周边的局势、台湾等），并对中国设置行政和其他障碍，同时希望避免损害已达成的经济合作水平。从欧盟方面，我们也可以听到对欧盟候选国的批评，这些候选国正在17+1合作进程中与中国合作。当然，这些批评旨在削弱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关系。从本质上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消灭中国作为全球竞争对手的地位，以及中国在他们认为是其影响区的世界部分地区的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人口潜力、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雄厚、军队强大、外交影响力强，使中国不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对国际社会事件影响不容忽视的全球性大国。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其他全球大国，主要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找到与中国达成一致的力量，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合作，解决所有开放问题，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人类未来。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China signed 201 documents o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20, November 18<sup>th</sup>). N1. Available at: <https://rs.n1info.com/biznis/a673371-juba-potpisala-201-dokument-o-saradnji-u-okviru-inicijative-pojas-i-put/> [塞尔维亚语].
2. „A law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is being prepared?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e Pelješac Bridge“ (2021, May 7<sup>th</sup>). B92. Available at: [https://www.b92.net/biz/vesti/srbija.php?yyyy=2021&mm=05&dd=07&nav\\_id=1853601](https://www.b92.net/biz/vesti/srbija.php?yyyy=2021&mm=05&dd=07&nav_id=1853601) [塞尔维亚语].
3. „Biden gathered an alliance: The goal is to contain China“ (2021, March 12<sup>th</sup>). B92. Available at: [http://www.b92.net/info/vesti/index.php?yyy=2021&mm=03&dd=12&nav\\_category=78 &nav\\_id=1825959](http://www.b92.net/info/vesti/index.php?yyy=2021&mm=03&dd=12&nav_category=78 &nav_id=1825959) [塞尔维亚语].
4. „Brussels is tormented by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Western Balkans“ (2021, May 13<sup>th</sup>). *Politika*. [塞尔维亚语].
5. „China is using all means to win a double victory – both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as well as the renewal of production“ (2020, June 22<sup>nd</sup>). *Politika*. [塞尔维亚语].
6.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Eight countries jointly against China“ (2020, June 7<sup>th</sup>). B92. Available at: [https://www.b92.net/info/vesti/index.php?yyyy=2020&mm=06&dd=07&nav\\_category=78&nav\\_id=1692614](https://www.b92.net/info/vesti/index.php?yyyy=2020&mm=06&dd=07&nav_category=78&nav_id=1692614) [塞尔维亚语].
7. „New global ranking of military power has been published: Serbia ahead of Croatia“ (2021, March 9<sup>th</sup>). B92. Available at: [http://www.b92.net/biz/vesti/svet.php?yyyy=2021&mm=03&dd=09&nav\\_id=1824204](http://www.b92.net/biz/vesti/svet.php?yyyy=2021&mm=03&dd=09&nav_id=1824204) [塞尔维亚语].
8. „The Americans have decided: Five Chinese companies are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2021, March 15<sup>th</sup>). B92. Available at: [http://www.b92.net/biz/vesti/svet/php.?yyy=2021&mm=03&dd=13&nav\\_id=1826122](http://www.b92.net/biz/vesti/svet/php.?yyy=2021&mm=03&dd=13&nav_id=1826122) [塞尔维亚语].
9. „The change of leaders in front of our eyes! EU urgently demands a harsher

strategy towards China, because the US is losing in the game of thrones“ (2020, May 25<sup>th</sup>). *Kurir*. Available at: <https://www.kurir.rs/planeta/3470183/smena-vladara-sveta-pred-nasim-ocimaeu-hitno-zahteva-ostriju-strategiju-prema-kini-jer-amerika-gubi-u-igri-prestola> [塞尔维亚语].

10. „The power of China shook the entire system: 'Monde' on EU, UN and the Health Crisis: The US is no longer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2020, May 1<sup>st</sup>). *Kurir*. Available at: <https://www.kurir.rs/planeta/3456705/moc-kine-je-uzdrmla-ceo-sistem-mondbez-dlake-na-jeziku-o-eu-un-zdravstvenoj-krizi-amerika-vise-nije-vodja-sveta> [塞尔维亚语].

11.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is happening in front of our eyes! EU urgently demands a harsher strategy towards China, because the US is losing the role of the greatest power“ (2020, May 26<sup>th</sup>). *Novosti*. Available at: <https://www.novosti.rs/vesti/planeta.299.html:866901-Smena-MOCI-sedesava-pred-nasim-ocima-EU-hitno-zahteva-OSTRIJU-strategiju-prema-KINI-jerAmerika-gubi-ulogu-NAJVECE-SILE> [塞尔维亚语].

12. Babić, S. B. (2010).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geoeconomic axis i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418–462.

13. Dešan, J. i Šumej, Dž. (2015).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ntemporary China*. Belgrade: Albatros Plus [塞尔维亚语].

14. Fortune. (2000). *Global 500 2000*. *Fortune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s://fortune.com/global500/2000/search/?hgCountry=China>.

15. Fortune. (2010). *Global 500 2010*. *Fortune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s://fortune.com/global500/2010/search/?hgCountry=China>.

16. Fortune. (2020). *Global 500 2020*. *Fortune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s://fortune.com/global500/2020/search/?hgCountry=China>.

17. Jinping, X. (2014).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8. Jinping, X. (2019). Jointly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of time and advance global

development. In: R. Pušić (ed). *Almanach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Belgrade: Faculty of Philosophy and Čigoja štampa [塞尔维亚语].

19. Kilibarda, Z. (2008). *Osnovi Geopolitike*. Belgrade: Faculty of Secur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Belgrade [塞尔维亚语].

20. Obradović, Ž. (2018a). „Belt and Road“ in the Balkans and Serbia (the challenges of cooperation). In: V. N. Cvetković (ed.) *New Silk Road – European Perspective (Security challenges/risks within the 16 + 1 Initiative)*, 157–177. Belgrade: Faculty of Secur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Belgrade [塞尔维亚语].

21. Obradović, Ž. (2018b). Serbia and Balkans on the „New Silk Road“ (Economic and Chropolitical Aspects of China’s Cooperation with Balkan Countries). In: Y. Jiemian and Ž. Obradović (eds). *The Belt and Road and Centrl and Eastern Europe*, Shangha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

22. Obradović, Ž., Jeftić Z., Stanojević P. (2019). Global Rel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erbia and China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L. Zuokui (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alkan Countri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ijing: China – CCEC Think Tank Book.

23. Obradović, Ž. (2016). „Belt and Road“ – Balkan perspectiv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spects). In: V. N. Cvetković, Š. Binhong (eds). *New Silk Road – Balkan Perspectiv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spects)*, 83–97. Belgrade: Faculty of Secur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Belgrade [塞尔维亚语].

24. Obradović, Ž. (2020a). „Covid-19 Pandemic: Consequen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Z. Jeftić and M. Kopanja (eds) *Infectious Diseases as a global security challenge – Covid-19 Pandemic: reality and consequences*, 9–42. Belgrade: Faculty of Security Studies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塞尔维亚语].

25. Obradović, Ž. (2020b). „Geopolitical interests of great powers in the Balkan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and the Kosovo question“. In: Z. Jeftić and N. Stekić (eds)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trategic action of states or the result*

*of global and local causes and processes*, 176–200. Belgrade: Faculty of Secur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Belgrade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塞尔维亚语].

26. Office of the Heading Grup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7, Ma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Concept; Practice and China's Contribution*. Beijing: Foreign Lauguages Press. Co. Ltd.

27. Steger, M. (2005). *Globalization*. Sarajevo: Šahinpašić [塞尔维亚语].

28. United Nations. (2019). *2019 Revi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Files/1Indicators%20\(Standard\)EXCEL\\_FILES/1\\_Population/WPP2019\\_POP\\_F01\\_TOTAL\\_POPULATION\\_BOTH\\_SEXES.xlsx](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Files/1Indicators%20(Standard)EXCEL_FILES/1_Population/WPP2019_POP_F01_TOTAL_POPULATION_BOTH_SEXES.xlsx).

29. Wang, Y. (201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What will China offer The World in its rise*,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30. Zuokui, L. (2016). „The 16 + 1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V. N. Cvetković, Š. Binhong (eds). *New Silk Road – Balkan Perspectiv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spects)*, 43–68. Belgrade: Faculty of Secur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Belgrade [塞尔维亚语].

31. Zuokui, L. (2017).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16 + 1), 2012–2017*.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32. Janković, A. (2017).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 connecting on the Chinese way*. Belgrade: Centar za istraživanje povezivanja Puta svile – CIPO [塞尔维亚语].

33. Džou, T. (2019). *Chinese dream and the Chinese way*. Belgrade: Čigoja štampa [塞尔维亚语].

34. Jinping, X. (2017, October 18<sup>th</sup>).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peach delivered at the 19<sup>th</sup> Nac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35. Mančang, L. (2018, March 2<sup>nd</sup>). Traditional friendship opens up a new chapter: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joint activities we strive for prosperity. *Politika*. [塞尔维亚语].
36. Lalić, V. (2020, April 12<sup>th</sup>). Francis Fukuyama exclusively for *Nedeljnik*: Neoliberalism is done. *Nedeljnik*. Available at: <https://www.nedeljnik.rs/fransisfukujama-ekskluzivno-za-nedeljnik-neoliberalizmu-je-odzvonoilo/> [塞尔维亚语].
37. „This is the end of economy as we know it“ (2020, May). *Nedeljnik*, No. 56 [塞尔维亚语].
38. Kavaja, J. (2020, May 5<sup>th</sup>). Americ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 their accusations of China. *Politika*. [塞尔维亚语].
39. Vujić, T. (2020, June 27<sup>th</sup>). IMF: Crisis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Politika*. Available at: <http://www.politika.rs/scc/clanak/457157/MMF-Kriza-kakvu-svet-nije-video> [塞尔维亚语].
40. Mitrinović, B. (2020, July 7<sup>th</sup>). Merkel: We do not know if the liberal system will win. *Politika*. Available at: <http://www.politika.rs/scc/clanak/457904/Merekelova-Ne-znamo-da-li-celiberalni-sistem-pobediti> [塞尔维亚语].
41. Multilateralism is important. (2020, October 1<sup>st</sup>). *Politika*. [塞尔维亚语].
42. A. M. (2020, November 1<sup>st</sup>). Only Chinese managed this and no one else: they emerged economically stronger from the crisis, and the secret lies in the words Serbs are familiar with. *Blic*. Available at: <https://www.blic.rs/biznis/ovo-je-uspelokinezima-i-nikome-više-iz-krize-su-izasl-ekonomski-jaci-a-tajna-se/j84vw99> [塞尔维亚语].
43. I. Š. M. (2020, November 2<sup>nd</sup>). Huawei Company is suing Warsaw and Bucharest. *Danas*. Available at: <https://www.danas.rs/svet/kompanija-huavej-tuzi-varsavu-i-bukurest/> [塞尔维亚语].
44. „A blow to Beijing, Chinese are furious“ (2021, May 10<sup>th</sup>). *B92*. Available at: [https://www.b92.net/biz/vesti/svet.php?yyyy=2021&mm=05&dd=10&nav\\_id=1854936](https://www.b92.net/biz/vesti/svet.php?yyyy=2021&mm=05&dd=10&nav_id=1854936) [塞尔维亚语].

45. Avakumović, M. (2021, May 11<sup>th</sup>). EU is preparing limitations for Chinese investments. *Politika*.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ika.rs/scc/clanak/478671/EU-priprema-ogranicenja-za-kineske-investicije> [塞尔维亚语].
46. Brkić, B. (2021, June 1<sup>st</sup>). Chinese Belt for the Serbian Road. *RTS*. Available at: <http://www.rts.rs>story.politika.21.04.2019> [塞尔维亚语].

UDK 339.727.24:327(510)  
339.92(510:100)  
评论文章  
投稿 25/05/2021  
收稿 31/05/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397

萨尼亚·阿雷齐纳<sup>1</sup>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PR China as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 The Chinese Mod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ssistance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 就开始实行对外投资援助政策。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其动机各不相同, 但中国领导层从未放弃将外国投资和援助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核心部分的决定。证明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模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领导层意图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有助于解决重要全球问题的“负责任的大国”这一基本假设, 在努力实现2049年实现“中国梦”这一最重要目标的同时, 作者运用了结构功能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

**关键词:** 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梦, 投资, 援助

**Summary:** Shortly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gan to implement a policy of providing investments and assistance abroad. Although the motives for this were different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never gave up on the decision to mak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ssistance

---

1 sanja\_arezina@yahoo.com

a central part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 prove the basic hypothesis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ssistance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show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that contributes to solving important global problems, while working to achieve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 achieving „Chinese dream“ by 2049, the author uses structural-func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Keywords:** Chin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Chinese dream, investments, assistance

## 介绍

自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会议上成立以来，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赢得内战后，这个党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党的领导把这个经济和社会遭受破坏、国际孤立的国家设法变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成员。尽管党的领导换届，环境变化频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定的目标依然不变——为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能源，收回中国所有领土，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Arezina, 2018年，第15页）。因此，可以说，中国衡量国力和自尊的基本标准被总结成两个词：团结和稳定。

按照这些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开始实施对外投资和援助政策。尽管此后几十年，中国领导人的动机不同，但中国领导人从未放弃将投资和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部分的决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此划拨的资金数额较大。1978年“改革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开放”政策开始, 中国领导层开始减少为此目的划拨的资金, 主要是因为需要将资金转向国家现代化 (Selden, 1978)<sup>2</sup>。只有在21世纪初, 由于经济增长迅猛, 财政资源雄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再次为此目的在双边和多边一级拨出大量资金。

尽管一些西方作者对中国投资和对外援助的动机表示怀疑, 但作者假设中国领导层正在开发一种投资和对外援助模式, 以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有助于解决重要的全球问题 (Zoellick, 2005)。同时致力于实现最重要的目标——到2049年实现“中国梦” (Gong, 2013)<sup>3</sup>。

前段时间, 对外投资援助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投资援助的一般情况。最重要的是, 关于在国外提供投资和援助的结构、范围和方式以及执行这一政策的机构的数据。<sup>4</sup> 本研究的重点是影响中国领导层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对外投资援助模式的因素。为了证明这一基本假设, 作者运用结构函数分析法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投资和对外援助模式, 以及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影响。本文还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将这一模式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模式进行了比较, 并将中国的多边对外援助制度与西方的OECD援助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将使用相关的学术文

---

2 当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2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8美元。

3 在2012年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提到了“中国梦”的愿景, 这一构想后来被解释为通过改革发展, 建成小康社会。

4 以下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Wolf, C. J., Wang, X., Warner, E. (2013). *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 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 Scale, Content, Desti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 C.: RAND Corporation; Brautigam, D. (2009). *The Dragon's Gi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ežina, S. (2018). *China in Europe*. Belgrad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et al.

献和政治文献、官员的声明和国际媒体的新闻。为了真实性，作者与官员、分析师、研究人员和记者进行了非正式交谈，他们直接参与了中国在海外投资和援助的各个方面。

本文有五个组成的部分。在介绍部分，作者陈述了研究的背景，解释问题的本质并提出了假设。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对外投资援助的历史。在第三部分，她列举了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对外投资援助模式的因素。第四部分阐述了对对外投资援助的类型和方式。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和得出的结论，并对中国对外投资援助政策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 中国对外投资援助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由于失去了西方的支持而面临封锁和禁运，但开始对外提供投资和援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此拨出的资金相当大，主要用于支持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外提供投资和援助，主要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影响。援助对象主要是与之发展了政党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运动和一些周边国家 (Brautigam, 2009年, 第32页).<sup>5</sup>

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北京正慢慢开始减少为此目的划拨的资金。究其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政策后，经济社会遭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奉献给自己的人

---

5 主要涉及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朝鲜和柬埔寨等国。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民,更不用说世界了。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转向本国的发展、改革和现代化,为此,它首先需要和平的环境。然而,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坚持“对外援助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中国发展以后也会是正确的”的主张。他将通过推行“改革开放”、“外交微笑”和“二十四字方针”(“耐心”政策;为外交政策和经济变革奠定基础; Kissinger, 2011年,第539页)<sup>6</sup>,在随后的35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从一个在经济和社会上遭到破坏的及国际孤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国际社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实施了经济现代化战略,其第一步就是“欢迎外国的大量投资进入”(迎进来)从而克服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出现任何重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的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率都很高(Cheng, 2014年,第1433页;贸易经济学, 2017年)。<sup>7</sup>这使得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第二阶段——走向国外市场的政策(走出去),以深化对国外市场、自然资源和先进技术的准入,带来额外的增长和稳定。这一政策被列入“十五”计划(2001-2005年), Arezina, 2016年,第14页)。这意味着北京将恢复为投资和对外援助拨出更多的资金。

在“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中,政府鼓励企业“进一步走出去”,从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性投资中转移更多的资本,并缓解人

---

6 1991年,邓小平制定了这一政治意愿,这是中国外交政策行为的基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7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储备达到2000亿美元,此后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长,到2020年底达到3.2万亿美元。

民币的压力。国务院决定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国家发改委编制了一份中国直接投资应投向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清单。焦点已经从香港和澳门、北美洲和西欧转移到亚太、非洲、拉丁美国和中东欧（16+1，2016年）。

在采用这个文件之后，中国领导层通过了“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推动了“走出去”政策的延续。重点是“包容性增长”，即深化分销网络和知名度，以及获取先进技术和研发机会（Sagers, 2012年）。2011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提出了以下原则：“向国外提供援助时，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帮助受惠国（……）为未来的发展和独立进程奠定基础[……]中国从不以援外作为干涉受援国内政或谋求自身政治特权的手段。”（中国国务院，2011年）。

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市场的持续不稳定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以此实现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这对中国的计划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和地区投资开辟道路（16+1，2016）。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以中国社会改革为重点，将改革与先进技术相结合。中国领导层认为，中国作为为第三方市场生产廉价产品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全球经济放缓导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中国产品的价格上涨是由于活跃劳动力减少导致工资上涨；这是老龄化社会的结果（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以及由于中国企业对环境保护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进行的投资）。此外，由于中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需求日益增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长, 因此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 有必要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结构, 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 为第三市场生产廉价产品的投资模式, 转变为以生产先进技术为基础的消费模式, 这些技术将被中国人购买 (Zapoljskis, 2016年)。因此, 中国领导层在2015年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中国制造2025; Lemton, 2015年, 第38页)<sup>8</sup>, 最早于2017年8月通过限制性法规, 加强对出境金融资源的控制, 以加强经济, 减少对政府不感兴趣、也不符合国家长期目标和规划的部门的投资 (Xu, 2017年)。

新的“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 考虑到了新的国际形势和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根据这一规划, 它侧重于“双循环”。这应该能够利用全球化的所有好处, 同时利用自己的能力。这意味着, 前期通过投资和援助走出国门的财政资源将有一部分有所减少, 旨在加强中国经济。最终目标是中国社会实现自给自足, 独立于欧洲、美国或非洲市场, 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生活水平足够高, 能够从中国企业购买高科技产品 (Arezina, 2018年, 第17页)。

按照这些规划, 中国领导层同时发起的各项举措和项目也进行了调整。最大的和全球最著名的“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提出, 目的是连接欧亚大陆 (西欧和中国东部) 两个经济发达的部分, 也包括其他大陆——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据估计, 这个项目涉及约44亿人 (占世界人口的64%), 以及占世界GDP 40%左右的国家。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的报告, 该项目的价值预计将达到一千多

---

8 该战略旨在加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并将这些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亿美元，这将创造几百万人的就业机会，并产生超过1000亿美元的税收。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把这些项目称为“世纪工程”。这些项目应该给“新丝绸之路”沿线的所有国家带来福祉（Kynge, Wheatley, 2020年12月11日）。

### 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对外投资援助模式的因素

几十年来，许多因素影响了中国领导层继续投资和对外援助政策。其中一些因素在一定时期内才极为主导，后期影响减弱，其他因素影响增强，而有的因素始终不变。因此，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将列在下面。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领导层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伙伴，使各国，特别是与之有良好关系的国家能够依靠它。这一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仍然是相关的，当时北京本身由于失去西方的支持而与封锁和禁运作斗争。中国领导人认为，为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有必要向所有希望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国家提供支持。冷战结束后，作为西方华盛顿共识的对应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自己的“市场列宁主义”提供经济援助的模式，称为“北京共识”（Cooper-Ramo, 2004年, 第39页）。

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投资和提供援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满足国内市场对重要资源的需求和海外市场对国内产品分销和销售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外交政策目标，中国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投资模式，注重走出去政策，并指出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互利共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赢的合作 (Zha, Breslin, 2010年, 第67页 )<sup>9</sup>。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由于担心失去美元的购买力, 中国政府需要释放外汇储备, 特别是美元储备, 并将其转为黄金和其他货币 (所谓的去美元化)。其原因是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不满, 由于美元不断大量印发, 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支出的增加, 美元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这导致了所有那些阻止美元失去购买力的人的恐惧 (Arezina, 2018年, 第94页)。

第四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企业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为此, 中国领导层使中国国有和中型私营企业得以进入国外市场。这些公司基于各种经营战略, 接受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 并将其作为对其他国家和世界各地需要投资各种项目的公司的投资。同时, 他们还通过创建国际投资组合, 吸收发展国内经济所需的知名品牌和先进技术, 提高了知名度 (Hong Hou, 2017, 第55页)。

第五个重要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增强“软实力”。也就是说, 除了世界上存在的1000多所“孔子”学院和在国际上宣扬“中国梦”的中国文化中心外, 对外提供投资和援助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国际化, 成为文化外交的一种形式。(仿效法语国家组织、英国文化协会和歌德学院; Arezina, 2018年, 第98页)。

第六个因素是加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以便在联合国 (代替台湾)、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Miljanic、

---

9 出口部门雇用多达4500万中国工人, 约占中国内地在职劳动力的6%。

1996年,第30页)。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典型的经合组织援助框架的独立的对外多边援助机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和区域多边发展组织建立了相对密切的伙伴关系。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多边援助的方式和形式变更多了,用于多边援助的资金大幅增加。同时,北京还发展了自己的多边发展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Hong Hou, 2017年,第11页)。

同时,通过发展对外投资和援助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积极影响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援助,减少政治条件(Milanovic, 2021年5月21日)。因此,在2017,美国开始与美国合作伙伴“安静地讨论”如何建立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可供选择的融资机制,提供给需要资本流入的国家。在这方面,已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欧洲开发金融机构协会签署备忘录,以促进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投资”方面的合作,并促进“民主价值观、自我维持的社会和加强最佳做法”(Smith, 2018年)。两年后的2021年3月下旬,美国总统拜登向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议,建立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作为上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倡议的替代方案(2021年3月26日, Aljazeera)。类似的合作,也在印太地区进行。2021年4月中旬,拜登总统向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Miki, 2021年4月6日)。

然而,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维护领土完整和恢复中国在“屈辱世纪”中失去的所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国家统一的“神圣目标”是每个中国人的任务,也是必然的历史进程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Medeiros, 2009年)。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并同时为其他国家带来好处。

## 中国的投资和对外援助

自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经济稳定以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是说, 1982年至1989年外国直接投资不足5亿美元的时期不同; 1990年至1999年, 这一数字上升到刚刚超过20亿美元, 而2000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足23亿美元。随着2001年“走出去”政策的实施, 中国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兼并、收购已有的知名企业或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因此, 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在2005年达到724亿美元, 并逐年增加, 2015年达到1356亿美元 (Blanchard, 2017年4月14日)。据估计,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的直接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 EY, 2021年)。这超出了Daniel Rosen和Thilo Hanemann的预测, 他们在2010年声称, 到2020年, “中国在世界上的直接投资流量将大大超过1000亿美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发达市场” (Rosen, 2009)。

由于中国资本在海外没有计划和合理的投资, 2017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通过了一些限制性法规, 以加强对金融资源出境的控制, 从而加强中国经济, 减少对非中央部门的投资。对于政府来说, 也不符合国家的长期目标和指示。在这方面, 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政策重点相协调, 确定了禁止、限制和鼓励三类直接投资。因此, 2017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下降了46%

，因为根据建议，海外房地产、酒店、电影院和娱乐业的投资大幅减少，对该“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增加。(Xu, 2017年8月28日)。

在对外援助方面，北京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模式——有中国特色的援助。这种模式不采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不同于西方模式。这种模式植根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思想，即华盛顿共识，这是建立在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的。这些措施被称为“休克疗法”，例如巩固国家预算、财政纪律等。这一模式符合中国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以1954年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4年周恩来非洲之行发表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为基础，赵紫阳1983年初访非<sup>10</sup>与“走出去”政治合著 (Bernasconi-Osterwalder et al., 2013年, 第1-2页)。同时，中国的援助模式基于三个原则：创新和因地制宜（采用先进技术而不是传播低水平技术）、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投资于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和可持续性维护独立（不干涉受惠国国内政治，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Jurisic, 1999年, 第38页）。

中国对外援助分为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提供的双边援助至少有九种：医疗队、培训和奖学金、人道主义援助、青年志愿者、债务减免、预算支持、交钥匙工程（基础设施、工厂等）、实物援助和技术援助。其中一些类型的援助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而另一些则是全新的 (Bernasconi-Osterwalder et al., 2013年, 第105页)。<sup>11</sup> 然而，提供财政援助的方式主要有三

---

10 这些原则规定，提供技术和管理合作不是干涉国家内政，而是有助于建立自信。

11 约42%的受资助项目涉及自然资源开发项目，40%涉及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与矿石、矿产和金属有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种: 赠款 (无需偿还的援助)<sup>12</sup>、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

在多边援助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对外援助体系, 并这些系统存在在西方国家典型的经合组织援助框架之外。原因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宣称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来自北京的援助与通过经合组织体系获得的援助相比, 在赠款中所占比例较低。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机构经常将中国在海外的援助列为官方发展资金的原因 (而不是作为官方发展援助; Hong Hou, 2017年, 第5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发展组织建立了较密切的伙伴关系 (Hong Hou, 2017年, 第51页)。最初, 中国的对外多边援助只包括两种形式的援助: 赠款和加入国际组织的付款。随着对外提供多边援助制度的发展, 更多提供援助的方式出现了: 捐赠和国际组织会费、资本融资和贷款以及与国际组织的项目合作 (Jurisic, 1999年, 第38页)。

中国消息称, 1950年至201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4000多亿元人民币, 启动项目5000多个, 完成项目近3000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培训项目1.1万多期260多个, 覆盖2000名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人员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数据, 仅在2013-2018年期间, 中国金融机构

---

关的项目, 18%涉及港口、学校、发电厂建设项目, 例如政府拨款、人道主义和技术援助。

12 应区分赠款, 主要是以人民币为主要货币的赠款, 以及现金捐赠, 这是对紧急情况或灾难的快速援助方式, 主要使用美元。

就安排了2702亿元的对外援助，分为赠款、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21年）。这类援助的一部分，相当于2600个项目，价值3.7万亿美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启动了（Aljazeera, 2021年3月26日）。

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出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19年的6%降至2020年的2.3%（Cheng, 2021年）。这导致了“双循环”政策的出台，根据这一政策，中国金融机构将把一部分资金转向国内市场，而其余资金将继续流向国外（Kynge, Wheatley, 2020年12月11日）。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出现导致中国对外援助从2016年的峰值750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20年的40亿美元（Kynge, Wheatley, 2020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到其“负责任大国”的作用，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健康之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北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20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各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和经济社会复苏。中国领导人提供了3亿剂新冠疫苗，其中向80多个急需疫苗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免费疫苗援助，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此外，由于最贫穷国家公共预算形势困难，中国已减免了这部分国家21亿美元的债务，并同意为23个国家提供再融资，价值13亿美元（Qiu Woo, 2020年11月20日）。在2021年5月21日举行的全球健康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开展合作生产（新华社，2021，5月21日）。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 结论

本研究的出发点是长期的对外投资和援助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领导层开始实施这项计划。分配给这个目的的资金数额根据中国领导层管理国家的情况而有所不同。然而, 这种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从未放弃。这种合作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接受援助的国家一样贫穷的时期仍然存在, 而且其优先事项是将所有财政能力用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了证明这一假设, 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参与解决重要的全球问题, 同时致力于实现最重要的目标——到2049年实现“中国梦”。在研究过程中, 作者着重分析了影响中国领导层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在研究过程中, 得出了一些因素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极端主导地位, 后来影响减弱, 其他因素的影响增强, 而一些因素则一直保持不变的结论。尽管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 但所有这些因素都对领导层寻求双赢解决方案、继续向海外提供投资和援助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 作者得出结论: 投资与对外援助模式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的多边对外援助体系与通过OECD体系获得的援助不同, 这是西方国家的典型特征。通过发展与西方的竞争, 这种模式大大有助于增加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虽然中国领导层对外投资援助的方式和资金分配发生了变化, 但这种模式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焦点。

对此,她指出,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领导层试图控制和指导这一模式的发展,使之与中国资本合理投资海外的计划相协调。因此,2017年8月,政府颁布了一些限制性法规;这些条例旨在加强对国家财政资源的控制,恢复中国经济,减少对中国政府不感兴趣、不符合国家长期目标和指示的部门的投资。根据这些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几年对外投资的资金减少了(仅2017年就减少了近46%)。

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和中国经济增长显著下降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金数额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需要将国外的部分资金转向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长远计划,但作者指出,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放弃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在国外存在的意图。在这方面,他们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组成部分——丝绸的健康之路——为国际社会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提供了重大帮助。

最后,结合研究结果,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对外投资援助模式为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上贸易额第一的国家、第二经济大国、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力资源最大的捐助国,贫困现象得到彻底消除。在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后,中国第十三代领导层采取了非常负责任的行动。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公平地分发疫苗,并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它减免了21亿国家对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并同意为23个国家的债务再融资,价值13亿美元(新华社,2021年)。这一切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助于解决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同时又致力于实现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最重要的目标——到2049年实现“中国梦”。

根据2021年1月10日发表的新的《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其中“援助”一词改为“发展”), 作者预计, 今后一段时期, 北京将继续以经济增长助力全球发展, 随着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和结束后将发生的新情况的不可避免的调整。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6 + 1 (2016, January 11). Analysis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CEEC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ttp://16plus1-thinktank.com/1/20160111/1091.html>. [英语]
- Aljazeera. (2021, March 26). Biden suggests creating initiative to rival China's Belt and Road.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1/3/26/biden-suggests-creating-initiative-to-rival-chinas-belt-and-road>. [英语]
- Arežina, S. (2014). Chinese 'going out'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relations with Serb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XV (1153–1154), 5–23. [塞尔维亚语]
- Arežina, S. (2018). *China in Europe*. Belgrad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In Serbian]
- Bernasconi-Osterwalder, N. et al. (eds.) (2013). *Chinese Outward Investment: An emerging policy framework*. IISD, [http://www.iisd.org/pdf/2012/chinese\\_outward\\_investment.pdf](http://www.iisd.org/pdf/2012/chinese_outward_investment.pdf). [英语]
- Blanchard, J.-M. F. (2017, April 14).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Boom. *The Diplomat*, [https://www.ey.com/en\\_cn/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q1-2021](https://www.ey.com/en_cn/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q1-2021). [英语]
- Brautigam, D. (2009). *The Dragon's Gi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语]
- Cheng, E. (2021, January 17). China says its economy grew 2.3% in 2020, but consumer spending fell. *CNBC*. <https://www.cnbc.com/2021/01/18/china-economy-release-of>

fourth-quarter-full-year-2020-gdp.html. [英语]

Cheng, Y. N. (2014). Virtual trading assessment techniques based on China's foreign exchanges reserves data. In: H.-C. Liu, W.-P. Sung, W. Yao (eds.). *Computer,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https://doi.org/10.1201/9781315760810> [英语]

Chow, L. (2021, February 8). Overview of China outbound investment of 2020. *EY*. [https://www.ey.com/en\\_cn/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2020](https://www.ey.com/en_cn/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2020). [英语]

Cooper Ramo, J.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英语]

Gong, W. (2013, November 23). Chinese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Lecture, Seminar „China's issues“.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英语]

Hong, Z., Hou, X. (2017). *China's Foreign Aid*, Singapore: Springer. [英语]

Hsu, S. (2017, August 28). China's New Capital Controls Expected to Slow Real Estate, but improve Country's Economic Health.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sarahsu/2017/08/28/chinas-new-capital-controls-expected-to-slow-real-estate-but-improve-countrys-economic-health/#6e2de76f66fd>. [英语]

Jurišić, K. (1999). Half a century of the PR China. *Politička misao*, XXXVI (3). 34—44 [塞尔维亚语]

Kissinger, H. (2011).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英语]

Kynge, J., Wheatley J. (2020, December 11). China pulls back from the world: Rethinking Xi's 'project of century'.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d9bd8059-d05c-4e6f-968b-1672241ec1f6>. [英语]

Lempton, D. M. (2015). *Follow the leader*. Beograd: CIRSD. [塞尔维亚语]

Medeiros, E. S. (2009). *China as International Act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英语]

Miki, R. (2021, April 6). US and Japan plan 'Belt and Road' alternative for Indo-Pacific. *Nikkei Asia*.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US-and-Japan-plan-Belt-and-Road-alternative-for-Indo-Pacific>. [英语]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Milanović, B. (2021, May 21). Competition Can Be Good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5-21/competition-can-be-good-developing-world?utm\\_campaign=fb\\_daily\\_soc&utm\\_source=facebook\\_posts&utm\\_medium=social](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5-21/competition-can-be-good-developing-world?utm_campaign=fb_daily_soc&utm_source=facebook_posts&utm_medium=social). [英语]

Miljanić, D. (1996). The oscillation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 *Međunarodna politika*. XXXXVII (1042) 29-32 [塞尔维亚语]

Qiu, S., Woo, R. (2020, November 20). China says has given \$2.1 billion of debt relief to poor countrie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debt-g20-idUSKBN28009A>. [英语]

Rosen, D. H., Hanemann T. (2009). China's Changing 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Profile: Drive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olicy Brief PB09-14*.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英语]

Sagers, C. (2012, May 10). China's 'Going Out' Strategy. *Diplomatic Courier*. <http://www.diplomaticcourier.com/news/regions/brics/952?showall=1>, 20. 6. 2017. [英语]

Selden, M. (ed.). (197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英语]

Smith, J. (2018).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strategic-implications-and-international-opposition>. [英语]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 China. (2011, April 21). China's Foreign Aid 2011. [http://english.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4/09/09/content\\_281474986284620.htm](http://english.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4/09/09/content_281474986284620.htm). [英语]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 China. (2021, January 10). Full text: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paper/202101/10/content\\_WS5ffa6bbbc6d0f72576943922.html](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paper/202101/10/content_WS5ffa6bbbc6d0f72576943922.html). [英语]

Trading Economics. (2017, August 31). China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1980–2017.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hina/foreign-exchange-reserves>. [英语]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 January 17). President Xi's speech to Davos in full.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1/01/president-xi-jinping-s-speech-at-davos-agenda-is-historic-opportunity-for-collaboration/>. [英语]

- Xinhua. (2021, May 21). Remarks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Global Health Summi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21/c\\_139961512.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21/c_139961512.htm). [英语]
- Zapoljskis, A. (2016, March 17). China has announced that it will tripl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70 million people a year. *Fakti*. <http://fakti.org/globotpor/kina/kina-objavila-da-ce-utrostrucavati-zivotni-standard-za-po-70-miliona-ljudi-godisnje>. [塞尔维亚语]
- Zha D., Breslin S. (2010). Oiling the weels of foreign policy? Energy security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haun Breslin (ed.) *Handbook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4--75). London: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英语]
- Zoellick, R. B. (2005, September 21).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prepared for delivery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英语]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sup>1</sup>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sup>2</sup>



**摘要:** 中国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实现生态的全面启蒙并重塑自身国际形象。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中国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还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此外,中国根据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人类生态目标,坚定不移地致力改善内部生态环境,调整未来工业发展政策。本文主要介绍了导致产生中国生态问题的一些政治历史原因以及中国在生态政策上的根本性转变,即从过去完全忽视生态环境到今天制定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新思想的十项生态发展目标。文章还特别回顾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生态环保合作和中国在生态技术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最后,作者就中塞在生态科技发展领域合作的可能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 中国、生态文明、生态政策、 一带 一路、习近平

---

1 dnadic@gmail.com

2 本文的一部分内容选自作者于2019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举办的*The Second USPIR Dean's Forum on Belt and Road and Euro-Asia Connectivity: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会议上宣读的未发表的演讲稿。该会议是由苏长和院长亲自主持的。

中国在建国七十多年里在生态问题上展现了不同的面貌，体现了一种特定的范式。新中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立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走与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目标一致的、自身的发展道路，因此其生态发展道路也较为坎坷。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礼治”和忠孝思想，这对实现中国宏大的发展目标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为往往有听从国家号召的广大群众自发地参加到建设活动中来。中国始终有三个最重要的发展目标，第一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在明确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朝着自己制定的共产主义愿景迈进；第二是走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的强国之路；第三是努力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中平等的一员。这三大目标正反映了中国及其在生态政策上所经历的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思想确实对全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们与自然的冲突。那些政治运动常常使用军事用语来发动群众，比如“征服大自然”，“发起抢收的总攻”，“挺进开荒大军”，“战胜洪涝干旱”、“消灭四害”等等。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三十年里，在诸多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政治社会因素里，有三个重要原因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第一是实施“大跃进”运动，以迅速改造自然，建设共产主义；第二是在具体策略上忽视了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上的不同差异；第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边疆地区屯垦建设等政策带来的人口流动。这种论断虽然听起来较为笼统，但基本上反映出那个时期的中国在处理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政策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太大不同，即相较于自然规律，更注重运用宣传手段宣扬“人定胜天”的思想。这些思想宣传和动员，

是为了促进经济和工业生产发展，提高社会总体水平，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赶超资本主义”，以显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相较于另一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等不良后果。

中国当时的第二个目标是在国际孤立的情况下实现自给自足，并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并不缺乏自然资源，缺的是现代技术，但现代技术的落后在那个时代是可以通过人力弥补的，于是便发起了征服大自然、加大对自然资源开发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生产运动。或许体现中国发动群众运动征服自然这一指导思想的最好实证就是治理黄河，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战胜自然的极其鼓舞人心的伟大胜利。早在公元前 2000 年，自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禹帝在九年洪水之患后开始建设第一个水利工程以来，治理和开发大河一直是中国处理与自然关系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重任，以为通过全民动员实现这个在执政前就开始拟定的宏伟计划，必将会得到人民的更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在中国所有的河流中，黄河是最容易发生水患的大河。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同时却也因频繁的水患而成为“中国的悲伤”。与人类史上的其他经验一样，这种改变河道、移山倒海似的改造大自然的行为并不是中国人独创的。比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动用大批（失业）工人建造的加利福尼亚州著名的胡佛水坝，也是使用了部分河流改道等人为改造自然的手段。但不管怎么说，中国至今仍面临着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因工业化而造成的诸多生态问题。中国生态发展的第二、三两个阶段，可以从中国通过发展科技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努力成为世界先进国

家中平等一员的目标来进行考察。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在政治上出现“软化”，在经济上向世界开放，为外国技术和投资打开了国门。当然，这一切变化并不是在一夜之间或自然而然发生的。但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意味着将面临一种新的危险，即陷入在新技术上依赖西方的尴尬境地，甚至沦为生态殖民地。事实上，中国可能是在一个最不利的时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因为当时的欧洲，或者说整个西方文明都意识到了一场生态危机的到来，于是试图将即将淘汰的老技术转移到还没有建立生态保护屏障的国家。也就是说，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种生态殖民主义就初现苗头，因为资本的流动不再（仅仅）取决于哪里能更多更快地获得利润，而是首先向那些政治实体没有生态意识的、或者是抵制这种新生态殖民主义的环保法规还不十分健全或根本没有的国家流动。可是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急需一个跳板，不仅实现自己现有技术的现代化更新和改造，而且还想引进甚至改进西方的技术。因此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方面，中国确实取得了在生产和贸易上全球领先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曾一度成了西方文明的巨大的垃圾场，成为全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我们从王久良导演2016年拍摄的纪录片《塑料王国》就足以了解到欧洲和世界的垃圾对中国社会和生态造成的严重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引发了一场生态悲剧。终于，2018年中国采取了禁止向中国境内进口用于回收的危险废物的措施。这项措施可以说明以下三点。首先说明中国生态政治经济意识大大加强了。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于1998年升为部级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被赋予了更大的监督权，同时大大加大了环保机构严格执行环保法规的行政权力，而在此之前这些规定仅是一纸空文。尽管这个部门当时的执法权力依然十分有限，违法现象普遍存在，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似已下定决心要扭转“世界污染最严重国家之一”的形象（详见 Shapiro, 2001: 208-210）。

“生态问题已真正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国领导层不仅意识到污染造成的健康问题和环境净化所产生的巨额开支、为日益加剧的水土流失、水患、沙漠化及沙尘暴所付出的昂贵代价，他们还从各项调研报告中看到，生态环境的退化还将进一步加速疾病率的增加、生产力的下降以及净化成本的提高，无疑这将大大抵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成效。因此，他们极其欢迎成本低廉、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绿色技术。”（Shapiro, 2001: 208）这意味着中国完全放弃了所谓的“危险资源”以及对这一产业经济的依赖，同时还对世界其他国家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现在得自己想办法进行对生态有严重影响的垃圾回收处理了。中国对世界关闭垃圾进口市场之举产生的第一波影响，便是国际垃圾回收政策一度出现了轻度危机，尤其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中国迈出的这第一步（中国生态政治的觉悟和成熟），我且借用1958年“大跃进”的提法，称之为“生态大跃进”，它始于 2018 年的禁止垃圾进口，但这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生态保护措施，也不是唯一出现的重大生态转变。

一年后，2019 年的中国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倡导下，不仅希望在工业、经济、贸易、军事和政治上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还希望在生态领域跟上时代的步伐。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十大生态政策，

更确切地说也是改善中国现有生态环境的十大目标。<sup>3</sup> 第一是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的奖励政策,中央财政奖补促“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厕所粪污基本得到处理和资源化利用。<sup>4</sup>第二,推进国家环保机构的严格督察执法,将环保问题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sup>5</sup>三是生态环境部公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其中包括深圳、包头、铜陵、威海等城市。四是交通运输部、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生态环境部等十二个部门推出《绿色出行行动计划(2019—2022年)》。<sup>6</sup>五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核安全白皮书》。<sup>7</sup>六是生态环境部召开全国扶贫日生态环保扶贫论坛,让生态环境保护贯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全过程,用脱贫攻坚的成效夯实乡村振兴的绿色本底和可持续发展根基。七是以水资源保护为目的,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两部委联合印发《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法》。八是发布《生态治理蓝皮书: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告(2019-2020)》。<sup>8</sup>九是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

---

3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访问日期: 2021.5.15).

4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访问日期: 2021.5.15).

5 见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在4月21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所做的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环境状况 and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6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访问日期: 2021.5.15)

7 “白皮书指出,原子的发现和核能的开发利用,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极大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核能发展也伴生着安全风险和挑战。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必须应对好各种核安全挑战,维护好核安全。”摘自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访问日期: 2021.5.15).

8 报告指出,中国生态治理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实现全面遏制土地退化目标的长期性;二是破解生态保护优先发展与产业化进程冲突的紧迫性;三是自然保护地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果的艰巨性;四是提升监测能力和构建现代监测体系的基础性。摘自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这一政治目标在 2021 年 4 月 22 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召开的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得以实现。习近平在峰会上的讲话展现出中国生态政策质的突破，打破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关于社会和自然关系的传统观念。习近平在讲话中说：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sup>9</sup>

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还突破了中国以往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框架，他说：

——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我们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要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sup>10</sup>

这些讲话内容是中国生态启蒙思想的核心所在。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向其他世界领导人传达的信息中还提到了三个重要原则，其中生态政治问题便是重中之重。第一个原则便是要“坚持系统治理”的思想；<sup>11</sup>第二得出“生活品质”的新理念，即除了消除贫

---

cn/reports/chinas-top-ten-environmental-policies-of-2019/（访问日期：2021.5.20）

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访问日期：2021.5.23）

10 同上。

11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摘自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访问日期：2021.5.20）

困、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应包括环境保护；<sup>12</sup>第三项原则阐明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时的政治立场，这也涉及到中国在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未来政治对话中所持的原则。概括起来，这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习近平指出，我们都有责任保护生态环境，但发达国家有义务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帮助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工业发展水平及能力对世界气候的影响并不像发达国家那么大。这样，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惯例站在了被边缘化的、不受保护的发展中国家的一边。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还提出了中国的生态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最后，中国第十大生态环境政策，即中国改善生态环境的第十个目标是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9月，“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博鳌亚洲论坛在京联合发布《“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英民出席发布会并致辞。《“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是联盟2019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有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发展的首份重要研究报告，也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就绿色发展议题发布专题报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从污染治理、生态系统管理和保护、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金融等绿色发展的六个方面，以富有成效、获得认可、可

---

12 “坚持以人为本。生态环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祉，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良环境的期待、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自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访问时间：2021.5.20）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推广复制的原则，选择不同地域、10个国家、不同行业的13个绿色发展案例进行分享。”<sup>13</sup>

从生态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至今仍颇受质疑，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为这项工程的性质作补充说明和解释。这里我们试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某些局限性，准确地说，从世界上，包括政治经济高层和一些学术圈子对这个倡议的看法谈起。

我们从媒体上经常听到的、甚至在一些学术圈子里比较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一带一路”是新中国霸权主义的表现，是中国想通过经济手段，特别是通过投资，实现和扩大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和控制。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是出于一种偏见。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经过各个参与国家公开讨论，交换意见和想法，最后经过修改补充后才正式提出的计划，这是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独特的全球公开讨论机制。我们不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球化”计划在实施之初是否也走过这样民主讨论和专家评审的程序，只知道“全球化”在推行后出现了负面影响，才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我们还知道，二十世纪推行的这种“单向全球化”进程最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术语来说这叫“气候变化”。与之相反，“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双向全球化”，而且是生态上可接受的“双向全球化”，就这一点我们稍后再加详述。我们认为这其实才是对“一带一路”产生偏见的症结所在。不少人仍然把中国视为经济和生态殖民的沃土，不愿接受中国在技术，特别是生态技术创新方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西方文明的事实。建立在扩

---

13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4/22/c_139899289.htm) (访问时间：2021.5.20)

张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是极为自私的，今天它的自私性只是更加隐蔽，有时候还带有政治伪装，但从其本质或从产生的后果上看，完全没有任何改变。西方经常对人颐指气使，带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口吻，实际上只不过是虚伪的优越感作怪。第一次“全球化”（单向的）不论从经济上还是生态上看都是失败的，是对世界的经济和生态的殖民化。

所以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双向全球化”的实证，也正因为这点它不被保守派接受。在此我们并不想使读者产生一种感觉，好像是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在讲话，我们仅引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个言论来充分说明美国对当代中国的态度。一次是特朗普发推文说：“全球变暖是中国人制造的骗局，旨在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但另一回他却说：“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空气和水质污染较严重，清洁方面都不是很好。他们一点都不管。”

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偏见的第二个原因仍根植于西方文明本身的特点，即与西方的自恋情结有关。他们的宣传机器为“西方产品”制造舆论，批评中国商品廉价劣质，使用寿命短。只不过这里已涉及到“双向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战了。造成偏见的第三个原因则是不实信息，诸如，大多数由中国资助的在中国境外建造的燃煤热电厂使用的都是低效率的亚临界燃煤机组，是各种类型发电厂中排放量最高的。散布这种谣言无非是想传递一种信息：中国不仅破坏了自己的生态环境，还会破坏投资地的生态环境，所以“新丝绸之路”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净化”中国，污染世界。

说实话，这种言论完全是出于典型的报复性思维，报复今天的中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国拒绝成为欧美的垃圾场。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抛开“经济战”不谈，我们换个角度看，中国已给出承诺碳排放量将在 2030 年达到峰值，随后将迅速下降，同时中国在《巴黎协定》谈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中国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C 以下努力的引领者。此外，中国还积极投资太阳能、风能、水电和电动汽车项目，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国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定义为“生态文明”，笔者不曾见过世界上还有哪位领导人这样提过，说希望本民族的文明成为“生态文明”。习近平还强调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绿色、健康、智力、和平”的丝绸之路。显然，习近平主席没有重复“单向全球化”的论调，也没有使用诸如“资本、人员、货物、思想、信息等自由流动”等经济殖民主义的词汇，而是提倡“双向全球化”的理念，其关键词是“绿色、健康、和平”，正如他在 2017 年 5 月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指出的那样：“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是从 2007 年开始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形态中的。之后自 2007 年至 2017 年，中国有 4000 多篇发表的文章和论著将“生态文明”一词作为关键词之一（Cuhn, 2019）。生态文明的理念认为自然与人是一种共生关系，大自然不能无限制无止尽地开发的，这种理念作为中国领导层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生态观的基本框架，<sup>14</sup> 能够协调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Cuhn, 2019）。这一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也被列入上文

---

14 从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到安德烈·戈茨（Andre Gorz）再到大卫·佩珀（David Pepper），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了解当代社会主义的生态观可参见：纳迪奇，2012。

所述的中国十大生态政策(目标)中,但这是否标志着中国从“自由环保主义”向“权威环保主义”过渡,有待于从政治和生态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Wang-Kaeding, 2018)。

以上我们陈述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偏见和支持的声音。那么真相到底在哪里? 我们知道,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生产领域是世界领先国家,发电量比排名第二的美国高出两倍多。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728 吉瓦,其中主要是水电和风电。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化石燃料发电及核电产能。中国是世界风能的生产大国,新风电场建设持续快速增长,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中国幅员辽阔,海岸线长,拥有得天独厚的风能资源,据估计,中国陆地拥有2,380 吉瓦的可开发容量,同时海洋有200 吉瓦的可开发容量。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和太阳能热能市场。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PV)安装国; 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生产国之一,仅次于德国; 2017年 中国是第一个累计光伏装机容量超过 100 吉瓦 的国家; 2018 年底,中国累计的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 174 吉瓦。截至 2018 年 5 月,中国在腾格尔沙漠建设的最大的太阳能运营项目保持着 1,547 兆瓦的记录。中国还在交通工具,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保持领先,2015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超过了美国; 2018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超过110万辆,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55%以上,并且比两年前的国内销售量增加了三倍,而同年美国电动汽车的销量仅为35.8万辆。中国政府意识到电动汽车可以帮助和带动解决一些最紧迫的能源和生态问题,比如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的问题,其次,中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国迄今仍是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大排放量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罪魁。

我2019年在上海的亲身经历也打破了本人对中国生态的一些偏见。虽然上海是中国的“示范”城市，但它可能并不是展示中国生态转型的最好典范，不过这个城市的一些方面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不仅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耸入云的商务住宅大楼，它还是一座绿意盎然的城市，有着整治和养护得很好的公园。虽然上海的城市交通十分拥挤，但它的空气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对上海的这种观感着实让复旦大学的中国同事感到惊讶和高兴。我特别注意到上海实行对传统污染车辆、新型电动及混合动力车辆、公共汽车颁发不同牌照加以区分的交通管理制度。电动车辆持绿色牌照，象征性地区别于其他交通车辆，而政府还为购买电动汽车者提供税收及其他财政减免等政策优惠。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在我下榻的酒店房间里放着一块通告牌，上面写着：“为了贯彻国家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政策并响应党的号召，本店不提供鞋油和鞋刷。”因为提供鞋油和鞋刷既不经济也不环保。中国在这场生态转型主要依托的力量是青年。尽管青年是以消费为导向的，但正式和非正式的生态教育体系都积极引导儿童和青年，尤其是学生群体，不仅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生态问题，而且还要在某些领域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掌握更多的资讯。

### 结语：塞尔维亚和中国

中国确确实实在努力改变自己在国内国际上的生态形象。虽然至

今仍存在着因过去长期在政策上不重视生态问题而遗留下来的问题，且还需花很长时间才能克服解决，但中国领导层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政治和生态目标，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生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即使不能成为世界上的领先国家，但至少也是国内外一个负责任的榜样。许多人对中国新生态政策的诚意还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认为不应该怀疑中国现代国家的特点，即中国为实现某种理想是一个重承诺且努力践行的政府，这是有目共睹的。当前中国更多地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彻底取代了毛泽东“人定胜天”的口号，其对生态环境的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塞尔维亚在生态技术上不论是同西方还是同中国相比，都大为滞后。也就是说，塞尔维亚因缺乏对上文提到的“绿色”和“健康”这两个关键概念重要性的认识，生态创新发展的进程已经放缓。目前，塞尔维亚处于一种特殊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我们有加入欧盟的政治愿望，这意味着全盘接受欧盟的生态标准，当然还包括来自欧盟国家的技术，而这些欧盟国家都是在“单向全球化”进程中走在前列的国家。而另一方面，塞尔维亚环境保护部今年的预算在增加40亿第纳尔的基础上，一共才123亿第纳尔。虽然与过去相比这个环保预算已高出许多，但要消除因长期忽视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后果以求与欧盟保持一致，这是远远不够的，也说是说，我们可用于生态转型的资金极为有限。塞尔维亚与中国有相似的经历，这就是我们都背负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生态问题，这意味着需要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中塞之间有着“钢铁友谊”和政治上充分的相互理解，鉴于塞尔维亚在生态现代化方面的生态利益，塞中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不应就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仅以投资铁路、收购钢厂和火力发电厂现代化改造作为起点和终点。这一轮中国投资给塞尔维亚带来的真正的风险是，个别中国公司，特别是“有害”的重金属加工业不按环保要求进行生产活动，还常常规避我们的环保法规。这已引起塞尔维亚公众舆论的极大不满，因为我们把中国看成自己的朋友，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中国企业能尊重并执行塞尔维亚的环保法和生态标准。当然，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应当面对现实，即资本和利润不管是绿色、红色还是黑色的，其本质都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自身的积累和增加。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下，塞尔维亚今后应在生态领域引进中国投资，即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可实际上，贝尔格莱德街头除了中国制造的手机（价廉物美，而且使用寿命也长），随处可见的还有“中国制造”的小米电动滑板车，只是这些电动滑板车也是需要能源的。于是，我们又回到没有政治冲突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气候变化的话题上，因为我们开发什么类型的能源以及我们留下什么质量的空气，这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金晓蕾 译）

参考书目：

Cuhn, B. (2019).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China*, DOC Research Institute, 2019. Available at:<https://doc-research.org/2019/08/ecological-civilisation-china-berthold/> (viewed: 23.5.2021).[In English]

Marković D.Ž. (2004). *Social Ecology*, Beograd.[In Serbian]

Nadić, D. (2012). *Essays on Political Ecology*, Beograd.[In Serbian]

Shapiro, J. (2001). *Mao's War Against the Natur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In English]

Wang-Kaeding, H. (2018), *What Does Xi Jinping's New Phra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ea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hrase is pressing*. Available at: <https://thediomat.com/2018/03/what-does-xi-jinpings-new-phrase-ecological-civilization-mean/> (viewed: 28.5.2021).[In English]

参考网站: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cn>

<http://www.xinhuanet.com>

<https://english.mee.gov.cn/>

**Darko P. Nadić**  
University of Belgrade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Belgrade (Serbia)

Summary

### **China's Ecological Path**

For almost two decad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on the path of complete environmental enlightenment and redesign of its charact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is becoming not only an active but also a dominant participant in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In addition, China is firmly determined to change its internal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and its policy of further industrial progress, harmonizing it with the generally accepted environmental goals of humanity. The paper presents the basic facts about certa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auses of inadequate

达尔科·纳迪奇 博士、教授  
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  
中国的生态之路

attitude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radical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iation from ignoring ecological problems to formulating ten new goals, ie ten ecological policie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the new ideolo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special review in the paper is given to the ecological elemen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revious Chinese achievements in ec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 also suggests a direction for possibl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Serbia in the field of that ecological-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vironment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Xi Jinping*

图片来源：新华社



中国风电场

# 书评



UDK 316.34(81)(049.32)  
316.34(470)(049.32)  
316.34(540)(049.32)  
316.34(510)(049.32)  
评论  
投稿 21/06/2021  
收稿 21/06/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836

普雷德拉格·巴伊奇<sup>1</sup>

联合体育学院 - “联盟大学——尼古拉·特斯拉”，贝尔格莱德  
(Union-Nikola Tesla University, Belgrade)

## 展望未来: 全球经济中的“金砖”中国



Li Peilin, M. K. Gorshkov, Celi Scalon and K. L. Sharma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BRIC countries: changes and perspectives. Textbook Institute, Belgrade, 2014, 846 pages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 金砖四国这个词变得如此容易辨认, 以至于在日常讲话和报纸报道中, 除了提到它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解

---

1 predrag.bajic@fzs.edu.rs

释。本世纪第一年,它由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在高盛投资银行的经济研究报告中创制,原名《世界需要更好的经济金砖四国》,利用了英语单词的发音。这样,他强调“世界需要更好的经济‘砖块’”,并在全球范围内把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潜力与日益增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为此他后来预测,到21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秩序可能会发生重大调整。

正是这些潜在更好的“金砖”在全球引起了广泛关注。报告将其他国家和投资者的观点集中在被公认为“世界工厂”(中国)、“世界原材料基地”(巴西)、“世界加油站”(俄罗斯)和“世界办事处”(印度)的地区。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经济潜力也将它们的相互合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此金砖四国第一次峰会于2009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举行,随后南非共和国也加入了这个圈子。

尽管与经济利益有关,这在全球一级是可识别的,但这些社会的其他部分仍然处于幕后,世界公众不太了解。社会学家团队试图通过一项全面的研究来改变金砖四国的社会分层:变化和观点(金砖四国社会分层手册:变化和观点),李培林、M.K.Gorshkov、Celi Scalon和K.L.Sharma,他写了所有九篇与印度有关的分析。这个收藏的想法是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和俄罗斯社会科学基金会(RFH)签署的合作协议的结果,之后通过与巴西和印度社会学家的合作扩大了这个收藏。结果是收集了36篇论文,分为9个专题单元,大量的数据、图表以及丰富的书目,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指导。2014年,在原版(由Miljana Protic翻译成英文)出版一年之后,教科书研究所出版了塞尔维亚语版。



普雷德拉格·巴伊奇

联合体育学院 - “联盟大学——尼古拉·特斯拉”，贝尔格莱德 (Union-Nikola Tesla University, Belgrade)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金砖”中国

封面上已经暗示，“这项比较研究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四个主要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回答了一个问题：这些新兴大国在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差异，他们可能志同道合，共同行动。”作者李培林在介绍中谈到了这一点，他强调“这些国家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将决定它们的未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社会经济格局。”28位同事的名单，他们的简短传记在介绍后的几页上，也谈到了认真。

这项比较研究的第一部分题为“社会分层的变化”，包括以下分析：巴西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化 (C. Scalon)、“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分层的变化” (Z.T. Golenkov和M.K. Gorshkov)、“现代印度的社会分层和变化” (K.L. Sharma) 和“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 (李培林)。

第二部分讨论了以下作品中的工人阶级：“1980-2010年当代巴西的劳动、工人和政治” (M.A. Santana)、“转型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从苏联到俄罗斯联邦” (Z.T. Golenkov和E.D. Igitkanijan)、“印度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工人阶级” (K.L. Sharma) 和“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现状与变化” (李伟、田锋)。

第三部分论述了以下作品中的农民问题：《巴西农民：反抗的历史》 (M. de Nazareth Baudel Vanderley)、“现代俄罗斯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 (AA Khagurov)，“获得独立后印度农民阶层的分层” (K. L. Sharma) 及《中国农村社会与农民》 (范平)。

在第四部分中，重点对公司和企业家精神进行了以下分析：“巴西的创新创业” (S. K. Guimaraes)、“俄罗斯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主要趋势和现状” (A. Chepureenko)、“传统与创业”印度私营企业家 (K. L. Sharma) 和“中国转型经济中私营企业的开端” (陈光金)。

第五部分从历史和当代趋势两个方面论述了中产阶级, 包括以下几部作品:《巴西中产阶级的创造: 历史与未来展望》 (A. Salata 和 C. Scalón)、“俄罗斯社会的中产阶级: 同质性还是异质性?” (N. E. Tihonov 和 S. V. Marejev)、“印度独立后中产阶级的崛起” (K. L. Sharma) 和“中国中产阶级的异质构成与多重身份” (李春玲)。

第六部分关注收入不平等:“巴西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层: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关键决定因素和变化” (L. G. Costa 和 C. Scalón)、“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 (J. Epikin)、“印度城乡地区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 (K. L. Sharma) 和“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结构特征和趋势” (陈光金)。

教育不平等是第七部分的主题, 包括以下论文:“巴西的教育不平等与社会分层” (M. da Costa, M. S. Kozlinski and L. G. Costa)、“教育不平等: 俄罗斯案例” (D. L. Konstantinovski)、“印度的教育和社会分层: 系统性的不平等” (K. L. Sharma) 和“教育不平等与中国教育的扩张” (李春玲)。

当谈到消费时, 这一主题在第八部分的以下分析中得到了阐述:“不仅仅是社会分层: 一种看待现代巴西消费实践的新方法” (M. Castañeda)、“俄罗斯的消费和生活方式” (P. M. Kozireva, A. E. Nizamova and A. I. Smirnov)、“新兴消费阶层及其生活方

普雷德拉格·巴伊奇

联合体育学院 - “联盟大学——尼古拉·特斯拉”，贝尔格莱德 (Union-Nikola Tesla University, Belgrade)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金砖”中国

式” (K. L. Sharma) 和“中国社会阶层、职业群体和身份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层” (田锋)。

在最后第九部分，题为“阶级意识和价值观”，以下作品被分组：“创造巴西的工人阶级：从工会到国家权力” (A. Cardozo )、“当代俄罗斯社会阶级与群体意识研究” (M. F. Chernish)、“社会和阶级之间的联系以及城乡地区的阶级认同” (K. L. Sharma) 和“中国社会阶级归属感和认同感” (李伟)。

鉴于“金砖”中国对世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在全球其他关系领域发挥越来越积极作用的王牌，本书中中国作者的工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那里的社会关系。也导致了这样的预测，即现在，当从分析执行期间的一定时间距离观察到这个集合时，在实践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其中有李培林在书的第一部分的结论，他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所经历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这种变化将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未来。他在论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将逐渐过去。”，“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中国制造’商品向‘中国自有品牌’商品转型，因此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工作质量上。”

谈到中国社会的关系，李伟在他的最新作品中谈到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感，一开始就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正如他所指出的，“它的社会阶层也经历了巨大的利益分层，因此在每个社会阶层中都有自我认同和群体意识

的形成,而群体意识又反过来,影响了阶层认同的不和谐与碎片化的出现。作者界定了阶级意识和归属于社会阶层的意识,以及社会分层意识本身,即公众对社会阶层间差异的感知。接着,他谈到了阶层认同意识,考察了一个属于某一阶层的个体是否认识到分离的边界,是否看到自己与其他阶层成员有着相同的利益,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意识。公众如何看待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正是在这一部分,作者解释了社会阶层是如何按利益划分的,但也存在一些利益冲突,认为其原因是“公民从与国家有联系的工作单位成员的身份转变为了更加独立的‘社会人’,而曾由国家控制的工作关系已转为由市场主导。”李伟举例说明了中国人社会阶层意识出现的一个特殊性,那就是“在更为敏感的阶层分类下,私营企业主宁愿把自己归为‘中产阶级’甚至‘劳动’和‘农村’,也不愿把自己说成“企业主的阶层”。作者指出,这是“西方阶级分析理论中从未注意到的一种具体现象”。

由于与这四个国家有关的孤立例子和许多其他方面,金砖国家收集社会分层:变化和观点是对那些在当前全球权力平衡中的国家进行的有价值的比较研究,他们不仅要争取“阳光下的地方”,而且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找到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安全利益。它还提出了一项研究,为在全球化时代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更广泛的背景。无论出版当天的时间距离,以及自该理念诞生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年的事实,其价值在于,即使有这样的差距,也足以让人了解当前事件,分析其间所做的事情,预测未来的进程。